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三十六年五月三日・售一千五百元

第二卷　第十期

五四專文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王芸生

寫在「五四」的前夕　吳世昌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費孝通

談「孔家店」　周綬章

討論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魏登臨

生活與文化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陳衡哲

觀察通信

五四前夕胡適專訪記（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記修築中的青新公路（西寧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藝

隨鐵大少回家　楊絳譯

讀者投書

李璜是否官僚・且看此事下文

「新」的感覺

華萊士生在中國

關于青年一個最普遍而又最眞實的陳述

對外容忍・對內決絕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又一例

觀察文摘

我們對于美蘇關係的態度　傅雷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李璜是否官僚•且看此事下文

編者先生：政府業已改組，青年黨獲得兩部。其事已成定局，靜待新官上任。其中李璜出長經濟部一節，關於李氏何日視事，甚至青年黨擬在該部安插多少黨屬，報紙早有記載。不料今天各報披載中央社重慶四月二十七日電：「李璜二十七日由蓉抵渝，定二十九日飛滬出席青年黨中常會，然後入京謁晤張院長，力辭經濟部長職務。據語記者云：在蓉聞悉中樞將畀以經濟部長職務時，即電岳軍先生遜謝，乃前日得張院長覆電，謂接電時明令業已發表，務請早日命駕，共任艱鉅等語。余係一介書生，未習實際政務，經濟事業，頭緒萬千，與其貽誤于異日，何如先行辭謝，故決於後日赴滬，出席本黨中常會時，說明此意，然後入京向張院長堅辭……。」原來李氏認爲「與其貽誤于異日，何如先行辭謝」，還要向張院長「堅辭」不就。關於李氏出長經濟部的內情究竟如何，我輩外人，不知其詳，但就常識判斷，李氏宣稱還要「堅辭」，不免是一番大大的「官腔」。雖然決定請你做部長，那就乾乾脆脆上任視事吧，還要扭扭捏捏擺什麼官腔呢？事到今日，還要表示「堅辭」，假如不是李氏本人幼稚，那就是他把今日一般人看得太幼稚了。老實說，假如李氏眞正存心不就，中樞也不見得非你不成，儘可優游錦城，毋須飛滬轉京。假如李氏心裏樂於一做，則打這種官腔，徒然浪費中央社的電報，糟蹋報紙的篇幅，而且增加一般人對於李氏的輕視。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看李氏究竟做不做這個經濟部長了。

編者先生：我願乘此向貴刊表示一點意見。前讀貴刊二卷六期投書欄內抨擊胡海門失言的一函，大爲痛快。那些在政治舞台上亂跑的人物，常常不知檢點，胡說八道。對於那些出言沒有分寸的人，我們非加以糾舉不可，藉以養成政界上一種自我檢點說話審愼的風氣，望希貴刊在這方面能夠多負一點責任。

徐　敬　四月二十八日　上海

「新」的感覺

編者足下：此次改組後的政府，以「新政府」名，但我們對於這個「新政府」並沒有什麼「新」的感覺，單就人物上說，國府主席當然還是改組前的蔣主席，而五院院長，除了行政院院長換了新人之外，其餘四個都是舊人。國府委員中，確是添了幾個「新人物」，但亦還不能新到使人發生「一新耳目」之感。行政院院長張岳軍氏，在他本人，雖然是新做院長，但這次改組，即使不是「聯合政府」，恐怕行政院院長也會由張氏出任，故張氏的出長政院，亦並無任何特殊的新意義。不過在許多年聲名狼藉的小黨，忽而夤緣時會，爬上了台，還抓着了兩個部，倒是「新聞」，而本來充其量祇配做一個荐任科長的人，一下子就連升三級做了特任的政務委員，尤足使人觸目驚心，引爲新奇。

秦鏡清　四月二十四日　南京

華萊士生在中國

編者先生：最近報上時有華萊士演說的新聞。他的主張有人擁護，有人反對；此處我們不加討論。我祇是想到，假如華萊士生在中國，要是他這樣大聲嚷嚷，大概早已失蹤。假如還能倖存，那他也絕無可能遍游國外，因爲他絕對無法可以領到出國護照和官價外匯。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朱天心　四月廿一日　上海

關于青年一個最普遍而又最眞實的陳述

編者先生：雖然你說「觀察」是一個高級刊物，它的讀者對象至少是大學生以上的智識份子，而我作爲一個高中學生，對於它卻非常愛好。最近出版的七、八期，我都細細地看過，細細地咀嚼着你們所主張的自由思想精神。其實，我以爲這種自由思想的精神，在我們中學生當中也能看到一點雛型。例如：現在中學生參加三青團的已經比在戰時少得多；而且他們現在大都認爲入黨是一種恥辱。去年秋天，這裏開學的時候，有一位三青團的幹事長來演講，宣傳的又是那一老套，並且他希望以後能與我們多接觸。可是，同學的反應非常不好，以致那些已經入了團的也極懈悅，於是他們就申訴說他們本來的「加入」也是被強迫的，現在也想脫離了。由此可見，右傾的現象的確在很快地退潮。然而，反過來看，像共產黨那樣激烈的左傾份子，這裏也幾乎沒有。大抵我們同學都以爲國共兩黨皆有缺點。在這種情形下，他們願意保持一種超黨派的地位。也許這就是一種近乎自由思想的精神。但是據我看來，這種精神也是很柔弱而容易被搖動的。因爲大抵他們的思想，在這種時局對立的矛盾下，僅是消極地保持一種旁觀的身份。他們並沒有有力的正確的判斷力去維繫他們這種自由精神，因此對於他們的所謂自由思想精神，祇能當作既不左亦不右的解釋而已。同時，他們之間又有着各不相同各自爲主的看法與觀點，決無法使之成爲一個集體組織而發揮它們的力量。

因此，我又不幸地看見一些情形，就是這些原來近乎自由思想的份子，有的受不住時局的壓力，因而變成過於左傾，或索性變成右傾，或者甚至墮落下來了的。這些都不是罕見的現象，說來令人惋惜！

馮明源　四月十一日　應城

對外容忍　對內決絕

編者先生：讀貴刊二卷七期讀者投書欄孫進明先生的「命的等級」一文，提及香港小販被踢的慘案，使我沉靜了的情感，又重新翻騰起來。去年，當王水祥案（下接二十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第十期
三十六年五月三日

本期作者

王芸生：大公報總編輯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周綬章：南京新民報主筆
魏登臨：
陳衡哲：著作家
楊絳：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授

五四 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王芸生

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五四開始啓迪了我的愛國心，五四使我接觸了新文化，五四給我的恩惠是深厚的。儘管許多先輩輕視五四，我卻決不心服。這或許是我的偏見，我的固執，但無論如何，五四在我的心靈上的影響是終生不可磨滅的。

每逢五四，我總戀念着這個偉大的日子，對過去對未來也總有所憧憬與期勉。奇異得很，今年又逢五四，這是我們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個五四，在我的心靈感映上卻起了不可言說的煩躁與不安。

五四巨潮掀天，是在二十八年前的民八，那是因為歐戰後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的不公所激起。在二十八年前的今天，我們是曾經對德奧宣過戰的勝利國，但是英法各國與日本訂過密約，承認日本攫奪中國的膠東半島，美國威爾遜總統也屈服了，我們的代表就要簽字了，而震撼世界的中國青年的怒吼爆發了。護國權，警邪頑，中國代表由此拒簽了巴黎和約，更由此展開了新文化運動。

今天呢？我們曾經抗戰八年，日本已無條件投降了一年多，我們是勝利大國，參加管制日本，在理論上，我們還要與美英蘇等主要聯合國決定對日和約，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因素，建立遠東的和平秩序，不使日本再成為我們生存上的威脅。這無論如何是大不同於二十八年前的今天了。

當年與今天，我們同是勝利國。但當年我們雖參戰而未曾作戰，且在歐戰期間，北京政府還與日本大大的鬼混過，所以勝利後的中國國際地位非常可憐。今天，我們曾苦戰八年，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縱然戰敗日本並非中國一國之力，我們畢竟是主要的勝利國。但是奇異得很，我們的國際地位還是極其可憐。而從日本問題來看，它對我們的威脅竟還一天天的在增長着。別人或許還未感覺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今逢五四，在我的心靈感映上湧起了煩躁與不安。

我最近去了一趟日本，看投降一年半後的日本，給我無限的感觸。日本是投降了，是被佔領着，繼受降的好像不是我們，執行佔領與管理的也不是中國。中國人在日本雖然是聯合國人，是受着歧視；中國代表團在那裏是當受氣的陪客。日本的工業力量還大得很，日本的軍事基地還多完好，日本的官僚財閥掌着政權，日本的軍閥餘孽滿佈全國，就是說，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還儼然存在。這情形，睜眼就可以看見，但盟國管制日本的措施，或隱或顯，像似意存掩護日本，讓它再成為一個能爭能戰的力量。我有眼睛，我看見了這情形；我有我的愛國心，我不能無一

緣爲國的憂慮。

我回國後，接連而來的日本消息，是日本保守勢力在四月選舉中獲得壓倒的優勢了；麥克阿瑟元帥連續呼籲爲日本增加主權，增加生產，恢復貿易。在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決定給日本保持一九三〇至三四的工業水準。美國這樣優袒日本，自然不是爲了對付中國，但却使中國重入噩夢，可能再遭厄運。在數字的現實上，我們的經濟生活與國家安全，都將受到威脅，我們有眼睛，應該看得見；我們有正義感，應該知所不平。我們應該對華盛頓有所爭，我們在東京也應該有所爭，但都寂寂無聞。假使我們爲了一種特定的外交觀點，或爲了一些不可必得的眼前的財政協助，而忽漠了這再一個百年國運的安排，那是我們對我們的國家及後代的不忠。

目前這個時代，實在太重大了。這時代，正是對內努力民主進步對外爭取獨立平等的時代。從對日關係看，這時代尤其重大。此時不小心，此時不力爭，一個封建黷武投機冒險的日本再起，那絕對非中國之福。縱使是日本再趨於毀滅，中國也受不起它的連累。

我的青年時代，是經過五四巨潮激盪的，到現在我還保持着我的青年的心。這顆心，又重新爲國家感到不安；而當年所乞求與呼籲的科學與民主，在我們的國土上微弱渺茫得很。二十八年，將近一代，當年的青年鬢邊已生白髮；世界經過偌大變化，國家遭遇如許刼難，祖國祖國，幾幾乎還是依然故我！

我是五四時代的青年，心頭尚在起着波瀾。

寫在「五四」的前夕

吳世昌

今日中國的局面，有許多與二十八年以前相像的地方：第一、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中國以戰勝國而不能乘機復興，依然爲同盟的國家所欺凌，不能與列强處於平等的地位。其次，英美於戰後重整東亞市場，中國在戰時興起的工商業被打得一敗塗地。第三、統治者到處內戰，民不聊生，政治腐敗貪污，知識分子苦悶到極點。內戰的背境，也都有各帝國主義者在背後鼓勵乃至操縱的情形。但是過了二十八年，當然也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方。第一、第一次大戰中國雖爲參戰國家，而戰場並不在中國本土，我們並未受到戰爭的損害，因此經濟的情形相當穩定，當時統治者也沒有發明通貨膨脹這件殺人不見血的武器。第二、當時內戰的規模不大，時期很短，一次會戰。一二個月便可結束，休戰比作戰時間長，更沒空軍轟炸。第三、當時內戰受害者限於作戰區域，軍隊是募兵，並沒「徵丁」「民兵」這些辦法，使人民觳觫就道，牽之千里以充砲灰。也沒有竭澤而漁，「徵糧」和「物資撤退」這些辦法，使戰區、非戰區、戰前、戰後同受禍害。第四、當時的軍閥雖然混蛋，却決沒有幻想到要奉獻祖宗的田地，作爲國際戰爭的修羅場，奉獻同胞的血肉，作爲引虎相鬥的香餌。當時的官吏雖然貪污，那時叫作「刮地皮」，但是刮下來仍舊在中國本土置產，至多有些現款存在中國的外商銀行裏，數目有限，而且輾轉仍在中國人手中，並沒有想到在南美北美，廣置園林，東歐西歐，遍營別墅。還有一點，當時沒有人呼籲言論自由，保障人權，因爲根本不發生這個問題。希奇古怪的法令，入人於罪的條例，老粗的軍閥是想不出來的。和現在的情形一比較，眞不知道是進步還是退步？今日中年以上的人，回想當時情形，彷彿已是「三代盛世」了。

但就在這三代盛世出現了奇蹟，後人叫它作「五四運動」。像中國近代史上一切青年運動一樣，其直接的發動力是抵抗外患，反對腐敗的賣國的官吏。但是當時人民對於北洋政府的不滿，却已縕蓄得很久，對於西洋現代思潮的認識，也已有了充分的準備，雖然那時受教育的人還沒有現在多。不過因爲那時候的「思想」未被「統制」，青年人的良知未遭摧殘，沒有世故，所以有眞愛，有眞恨，有是非，有判斷，有熱忱，有勇氣，而問題也比較單純，所以這個運動起來以後，各地響應，能造成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

這個運動雖由外交問題引起，却迅速發展爲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工作。政治方面主要的口號是德謨克拉西，亦即今日的所謂民主。文化方面推崇科學，不過這是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自然科學則在清末即已有人提倡，即所謂「格致」，所謂「聲光電化」；社會科學則因受「中學爲體」說之流毒，嚴復所譯的書被人當「先秦諸子」讀。直至五四以後，各種政治學說、主義，才被大量介紹進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構成，亦頗受此時期大量介紹進來的社會學說之影響。但是五四時代對政治有興趣的人跑到廣東去參加國民革命了，剩下來發揚光大這個運動的都是文化方面的人。從文化的又演變成文藝的。使中國政治的改革，民主的實現，像走馬燈似的跑了一圈，依舊掉在內戰的泥淖裏，毫無希望。

× × ×

中國今日的局面，比起民國八年五四的前夕來，實在嚴重得多了。擺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名義上被我們戰敗而實際上在美國卵翼之下蒸蒸日上的日本，是東亞最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夾在我們兩邊的是兩個爭世界霸權的左右兩極端的國家：蘇聯和美國。這兩國各有其衛星國，各有其經濟體系，各有其強大軍備，而尤其可怕的是：各有其對中國的野心，各有其在中國政治集團中的勢力範圍。一個國家夾在現代列強集團之中，兩集團對之都想拉攏或利用，並不一定可怕，這次大戰中的土爾其便是如此，就要看執政者如何應用其形勢。而今日的中國，却不但不向緩衝兩列強集團的路上走，反而有意無意的向着使這兩集團的矛盾尖化銳的路上走。至於國內的經濟情形，八年的作戰早已消耗到不可忍受的地步，通貨的膨脹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却仍舊壓榨人民的脂膏，來塡這內戰的無底之壑。在今日內戰的區域，其破壞之徹底，死亡的慘重，遠過抗日的國際戰爭，然而這個內戰，人民望不到停止的終點。照共軍的流竄性質，以及過去剿共的經驗看來，有很大可能會比抗日之戰更久。所謂三個月或五個月消滅其主力云云，似乎只有自我安慰的價值，這個內戰如果打下去，中國人自己不想法子停止它，終將在歐洲問題解決以後，招致國際的干涉。否則其結果必且更慘，因爲那就要把中國問題與歐洲問題一起解決，而那樣的解決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的政黨，除了有槍的正驅人民以努力廝殺以外，有二個在講了許久價錢以後，參加了政府，已開始共同「訓政」。剩下來的一個在今日局面之下，也已不起作用。這一年多以來，人民對於若干政黨的觀感，可以用孔子的兩句話來說明：『始我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我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這個「始」字可以指「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至於信仰英美派民主政治的人所屬望的自由分子，固不論今之從事實際政治者對這些人有無興趣，就算有罷，這些「自由」分子加上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清高」，根本上無法適應今日的政治活動方式。今日的政治活動必須靠組織，而中國人的「自由」「清高」和「組織」是根本衝突的。再加生活的壓迫，使他們的心神完全消耗在日常瑣事上面，無從對於當前國是作認眞嚴肅的考慮。人權的無保障，又使許多人雖有考慮而無從表達其意見。這批自由分子連考慮國是尙談不到，如何能表達意志？連表達意志尙談不到，如何能有組織？連組織尙談不到，如何會參加政治，使它民主起來？現代政治方式固然離不開政黨，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掉在這樣的政黨手裏，眞是這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大悲劇。

而這個悲劇的犧牲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無辜的文盲，他們出糧出丁，出力出命，爲的是導演的老爺們要做廝殺的游戲，他們把這游戲叫作「自衛」，「戡亂」，「鬥爭」，「革命」。文盲是不懂這些名詞的。他們所以要倒霉，唯一的罪狀是：因爲父母生了下來，所以要去送命；因爲出力種田，所以應該出糧！而所謂智識分子也者，看着這個大悲劇的進行，沒有勇氣去想它，想了也沒有勇氣說出意見。導演者因此有了理由，至少你們都是默認這場好戲的。

× × ×

在這「五四」的前夕，望望中國的前途，看不到有什麼光明。甚至於連「五四」本身有沒有完成其歷史任務，以前不成問題的，在今日想來也頗有問題，「五四」以政治運動始，以文藝改革終。政治運動的主要目標爲求民主，而到今日所謂民主云云，演變成黨派爭府委、政委、部長、省主席的資本和內戰的藉口。「五四」運動的中堅分子沒有意識地完成爭民主的歷史任務，二十八年以來中國依然是槍桿的天下，終是事實。不過凡是運動都是暫時性的，其最好的效果是教育性的。如果一種運動有持久的力量，亦必由於教育的輻射傳遞作用。以這兩種作用而論，「五四」確已做到；文化、文藝，以及社會各方的改革是它的輻射作用，上海「五卅」北平「一二九」，昆明「一二一」，重慶「一二二五」都可算是它的傳遞作用。「五四」是青年運動，但其輻射和傳遞兩種作用都不僅教育了青年人，也教育了中年和老年。華茨華斯曾經說過：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

那是在他望見天邊虹彩的時候。

在這風雨如晦的天邊，我們什麼時候再可以望見虹彩？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

費孝通

安平兄：

承你來信約我在觀察的「五四」號發表一點關於青年思想問題的意見。這幾個星期來，爲了「五四」又快到了，不少朋友會要我寫些應時的文章，我都拒絕了。不是我不願，實在是不能。這幾年來我在學校裏教書，時常和青年們見面，也時常和他們談話，我最大的「發現」是他們現在所逢到的處境和我們一二十年前所逢到的實在差別太大。我說「發現」是因爲我同時知道很多和我年齡相近或更老一輩的朋友或前輩們似乎還沒有對這一件極明顯但又極不易正視的事實有認識。他們還是根據他們自己在青年時代的經驗來給現在的青年人作「指導」。我在旁觀看，青年們客氣一點在心裏笑：這些老馬自己都迷了路，怪可憐的；不客氣一點就在背後什麼話都可以說得出來了。前輩們並沒有機會去瞭解（自己沒有經驗的事本來說不上瞭解的）青年們，他們總覺得現代的青年不對勁，和自己認爲正確的標準不合；不是從而覺得世風不古，也就疑神疑鬼，魔高十丈超過了自己祇有一丈高的道了。他們可以討厭青年，甚至仇視青年。兩代之間的隔膜，在我自己可以記得的時代來說，實在是沒有比目前更甚的了。

我想你一定會同意我，當我們初入大學的時候，還不到二十年，我們並不關心畢業之後的出路。不關心並不是有意逃避，而是不必我們關心。我們似乎有着一種保證，祇要我們每門功課都好好念，我們的前途是不必焦急的。事實確是可以使我放心，努力讀書的人，同學裏敬愛的人，出了學校確是在社會上有表現的。也許因爲有了這保證，我們那時可以爲知識而讀書。我們覺得這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應當的。我們這點信念並沒有欺騙我們，因爲這條道路曾帶我們到現在，並沒有引起過我們懊悔的現在。我們經了這幾十年爲知識而讀書，使我們發現了其中的興趣，不論人家怎樣說，我們也自信這是有價值的。我們也不必太自作淸高，這條路雖沒有給我們富和貴，但是憑良心，我們的物質生活確是比一萬人中九千九百九十九個都高。我們還能有什麼奢望？在這饑餓的國家中到現在還沒有挨過餓，你想！

我們自己的經驗引導我們覺得這是青年們全都應該走的道路。這樣想也許不妨。我們的錯誤是忽略了現在的青年們沒有我們那時的處境了。假如我們自己走的是「正道」，現在的青年走的是「邪道」，我們也得看看爲什麼現代的青年走不上我們的「正道」的緣故。

我初回淸華園很高興的拉着幾個在昆明時相熟的學生各處去參觀，我指給他們看那是我們的飯堂，「那時，飯桌是白磁的，想吃什麼到櫃上去拿，如果櫃上的菜不喜歡還可點菜。」——我沈醉在記憶裏，「我們沒有錢也不要緊，每天還是吃牛奶，炒麵散果兒，反正到月底有三十元研究費。」我回顧大家，沒有人笑。閒坐說玄宗的宮女的幽默引不起反應。

「這是我的研究室，我還買了個香爐，燒香，在月亮天，關了燈，伴着骷髏靜坐……多有詩意！——」我沒說完一位學生插嘴說，「你從沒有捱餓過失業的罷？」我很快的回答：「我是很會考試的，而且，卽使不能出洋，留校一直可以研究下去呀！研究到出國。」

這句話大概已引起了學生們心裏的批評；「這樣簡單的頭腦。」至少我也已感覺到他們對我的話毫沒有興趣了。一些太和現實關聯不上的歷史佳話。

於是我聽他們的話了。一位學生和我說他已經有五六年沒有接到過家裏的信。「我離家裏時剛剛小學畢業。我跟了個親戚到後方去，一直就沒有過家。」

「你怎麼活的呢？」

他笑了，「我自己也不明白。誰有錢寄來，大家就分着化。」他看了看其他的同學。他知道我是不會明白他們的。「我們衆事，我們拿公費，有什麼錢就化什麼錢。」

「畢業之後呢？」

「不知道。費先生，這局面不會長久的呀！」這答語使我感覺到一些不舒服。我好像看見滿天的飛絮，不知會落在什麼地方，似乎毫不顧戀般的飄着，我在理知上也承認他們的結論，但是我一切的工作，那一項不是假定着有明天，有明年，甚至有下一代？我不能想像我一旦拋棄了這假定我會怎樣。我不能想像，因為一方我沒有這經驗，一方也許是我事實上還不致這樣。但是現在確是有無數已經多年在不安定、流浪、沒有標準、沒有一定道路的環境裏長成的青年們。他們並不完全從和我同樣的假定上來規畫他們的生活了。

我想和自己說，「這多危險！」我曾在「重訪英倫」的通訊中講到過一個人不能在沒有前途的信念中生活的。英國的復興在我看來是很穩的，因為我所接觸的人中，大多是知道現在應當做什麼，做了會有什麼結果。我在想時，那位學生又說了：「我們所受的教育其實並不壞，我們已知道我們的將來是要自己創造的，沒有安排好了的道路。」

我常記得這句話，因為這句話是對我自己的譴責。我們說現在的青年人走上了邪道了，着了魔了。他們甚至不再和我們討論他們的問題，不再承認我們的尊嚴了。這些可能都是不好的，至少可以使我們不喜歡的。但是讓我們自省一下，假如我們認為我們自己青年時代走的路是正確的，這路是我們上一代的人給我們安排下的。我們的責任顯然不祇是走這道路而且應當是去安排我們下一代的道路。下一代的人向我們說「沒有安排好的道路」不就等於說我們沒有盡責麼？

這樣說來，我不能不懷疑我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了。若是正確的話就不應該「過河拆橋」，使後來者得自己去創造他們的道路了。不但如此，從我們認為正確的道路上走出來的人，看着了青年們「幼稚」「過激」「着迷」「入魔」而在嘆氣了。他們忘記了如果沒有了安排好的路，要找新路，「試驗，錯誤，再試驗」是必然的過程。我們既沒有給他們前途，又為了自己的利益，不許他們找前途，青年們怎會不把我們作為絆腳石呢？即使青年們的確做得不對，這責任顯然還是在我們。

安平兄，我寫了這許多話，似乎祇是一種自己的懺悔。太消極了。但是這時候也許正需要我們這一代在未老而已不太年青的人們自己反省一番了。「五四」的一代是否已經死了？我實在不敢回答。我很怕將來檢討中國這半個世紀歷史的人會譴責我們，現在在四十左右這一代，我們祇會走已安排好的路，而沒有為下一代安排新路。

我知道我並沒有寫出你所希望我的文章來，但是我除了這些話，還有什麼呢？我懇求於我同代的朋友們，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去幫青年們去探索出路，千萬不要不負責任的說閒話，更不可成為青年們的絆腳石。我們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是很成問題的。

孝通，四月二十三日

談「孔家店」

——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

周綬章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

——陸機文賦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有了二十八個年頭，而環顧國內局勢，還是這樣的動亂，政治上、社會上，固然是擾攘不寧，混亂已極，即就文化上來說，也是徬徨困惑，無所適從。一方面，由於抗戰期中，民族自尊心的提高，使許多人對於固有文化精神，在那裏低徊嚮往；一方面，面對着高速度原子能時代，大家又感到「時不我予」，有着落伍的威脅。因此，不僅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的若干現實問題，無從索解，對於未來新文化的建立，尤其感到茫無頭緒，難於下手。我在這裏，打算把中國舊日的文化路線，作一客觀的檢討，一方面，溫故知新，做一些思想上的揚棄工作，對於未來新文化的創造，也許有點補益；一方面，所談的若干問題，表面上

好像與現實無關，實際上有好些地方都可以映射住現實，能够在與我們這一代息息相通的文化思想上，作一清算，也許有助於若干現實問題的解決。

一

五四運動中的一般健將，所喊出來的口號，對於西洋文化的吸收，則是「歡迎德賽二先生」；對於固有文化的批判，則是「打倒孔家店」。這兩者之間，有着函數的關係，「孔家店」不打倒，德賽二先生不會進來，同時也可以說，不歡迎德賽二先生進來，「孔家店」也不能完全打倒，兩者互爲因果，應該雙管齊下。關於德賽二先生的問題，研討的人已經很多，在這裏只談談關於「孔家店」的一些問題，以紀念五四運動的二十八週年。

要打倒「孔家店」，自必先要了解「孔家店」是怎麼一回事，然後才能談如何去打倒。要了解「孔家店」的情形，又非把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發展的大概，描繪一個輪廓不可。

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勢均力敵，無所軒輊，卽就韓非子所謂的「顯學」來說，儒家之外，也還有墨家，而且大體說來，戰國時代總算是縱橫家的全盛時代。儒家中的孟、荀，兩派都很倒霉，未能見用於世。到了西漢初年，文景之治，崇尙黃老，儒家亦未得勢。至於武帝，才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骨子裏面，兩漢都是陰陽家的黃金時代，讖緯符籙之說籠照了一切。眞正的儒家思想並未大行於世。到了曹阿瞞起來，主張霸道政治，更是什麼都不管，有才無行的人也盡量錄用，爲一種縱橫家與法家的混合運用。正始以後，何晏王弼大煽玄風，而風氣一變，魏晉南北朝，在哲學思想上，全是幾個道士和尙的天下，陶宏景、寇謙之，以及支道林、佛圖澄、鳩摩羅什、達摩諸人，實際上主宰了當時的思想界，這是儒家勢力最低落的時期。到了唐代，因爲皇帝姓李，硬要拉關祖宗，把老子李耳奉爲太上玄元皇帝，道教成了唐代的國教，公主貴人多出家爲道士，孔子只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當然不能和太上玄元皇帝相比。直到韓愈出來，追蹤揚雄、孟軻，主張文以載道，才把儒家的道統慢慢豎立起來。降至宋代，理學興起，雖然骨子裏面已經融合了釋老之說，但就他們的標榜上說，的確是儒家勢力勃興的時期。帝王也特別尊崇，孔子被推尊爲大成至聖先師，當作萬世師表。儒家勢力的勃興，自二程夫子發難，至朱子而集其大成。宋以前只有儒家，而無「儒教」，程朱以後，事實上已把儒家變成「儒教」，這是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中國文化衰退的樞紐。明代王陽明出來，而風氣又一變，明末，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諸人以質實樸厚的精神，矯理學末流之弊，中國的學術才漸有起色。清代漢學大行，戴東原更以客觀的實證態度，抨擊宋儒的空疏不學。梁任公「但開風氣不爲師」，倡導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章太炎則集國學之大成，爲清代樸學的殿軍。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學術文化才轉向到現代化的途徑

二

現在我們可以談孔家店了。我們可以說，宋以前只有儒家思想、儒家哲學，無所謂「孔家店」，宋以後，把儒家變成「儒教」，事實上才把「孔家店」開設起來。我們要打倒的「孔家店」，正是宋以後，道學家的末流所開設的「孔家店」，與眞正的孔孟思想關係較少。

儒家的鼻祖孔子，出身於封建制度下的「士」的階級，本來連「大夫」的身份都沒有。所以說：「自吾從大夫之後，則不可以徒行矣。」封建時代的「士」微末得可憐，自然把統治階級看得神聖不可侵犯。而又滿懷着救世救人的熱情，眼看着天下大亂，封建制度快要崩潰，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要主張正名分，時常夢見周公，希望把周有的封建制度維持下去，回復到西周，至少是東周初年的「盛世」，要使「亂」趨於「治」，「分」至於「合」，在當時自不能不尊重王權，使天子、諸侯，大夫，士人各安其分。在他本人，行道濟世，惟在求其心之所安，並沒有後世儒家動輒要作「帝王師」那種神氣。卽就他本人的修養來看，也只是一個和易可親的藹然仁者，極富於人情味，能哭能歌，不忮不求，教授門徒，也不過是不見用於世，退而講學，好栽培些桃李，以行道濟世，並沒有如後世儒家所想像的，道貌岸然，神氣十足的一位大教主那種意味。只要把論語和孔子世家多體味一下，便不難證明這一點。所以，孔子本身並不想開孔家店，也沒有開孔家店，不能把他當作孔家店的老闆。

至於這位「亞聖」孟子，更誰都知道他富於民本思想，性情剛健熱烈，敢說敢言，反對鄉愿，正氣浩然，那裏有一點道學氣，頭巾氣？至今，

便多修談民主的人，還要捧捧孟夫子，當然也不能把他拉在「孔家店」之內。

然而，「孔家店」究竟是怎樣來的？推本窮源，當然董仲舒要算一個發起人，但因他自己的陰陽怪氣，事實上並沒有開得好。韓愈出來已經要準備好好的開，因為不得帝王的支持，又沒有弄成。真正的孔家店之開設，要算在程朱以後，把儒家變成了儒教，加以統治者的崇敬，「孔家店」便興盛起來，小程夫子可以說是「孔家店」的董事長，而後來的朱子，則成了「孔家店」的總經理。此後，孔家店的規模完備，旗幟鮮明，主宰了整個的中國思想界。然而程朱時代，「孔家店」的貨色，還有很多有益於學術人心，未可一概抹殺。到了後來，理學家的末流，便把「孔家店」弄得一踏糊塗，貨色愈賣愈糟，終至於遭致「打倒」的命運。不過五四時代，大家打倒「孔家店」，事實上失之於鹵莽滅裂，並沒有把「孔家店」的貨色澈底弄清楚，所以只是主張「非孝」的吳又陵，就會被胡適之譽為「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不過經過許多人的努力，總算把「孔家店」折樑換柱，根基動搖起來。自然也有不少的人要來支持門面，想把「孔家店」維持下去，因此才有若干次糾纏不清的思想上的論戰。抗戰以後，大家都說民族自信心恢復了，許多人遂乘機想把「孔家店」改頭換面的開起來，而有所謂「孔學會」的組織，「可惜」終於敵不過時代潮流，沒有完成他們的「宏願」。

三

我們再來看看「孔家店」裏賣的是些什麼貨色，這裏可以分成三點來說：

一、儒術與皇權　孔子、孟子，雖然都要遍干諸侯，希圖見用。然而，周游列國，但以行道為念，並不特別對於那一個君主，表示死心踏地的擁護，也沒有把他們全部學問，去替帝王統治作注腳。到反而是扞格不入，未為時君所用。程朱以後的儒家就不同了，他們動輒以「內聖外王」之學自詡，總以為應該作「帝王師」，要把「儒術」全部奉獻給「皇權」，賣身投靠於帝王之門，甘心作御用學者，替帝王的無理統治作注脚，當「律師」。而帝王本身也覺得這一批忠實奴才大可一用，於是以「禮賢下士」為名，實際上招徠這些「孔家店」的老闆、夥計，以至於學徒，替自己作思想統治的工具，而這一般人當然是感恩圖報，覺得「天王聖明」，應死心踏地的為王家出力。雖然也開口「仁政」，閉口「名教」，實際上不過是把統治者扶着騎在老百姓鼻子上而已。儒術與皇權的結合，表現了儒家哲學衰退，把「學術政治化」，自己再沒有了獨立的精神，新鮮的生命，而中國的專制政治也達到登峯造極的階段了。我們看現在正在做着「應帝王」的美夢的「大師」「學者」，不是還多着麼？這些人正是些「孔家店」的老闆，不管怎樣文飾，其根本面目是無可躲藏的。

二、「吃人的舊禮教」　五四運動以後，我們喜歡罵「吃人的舊禮教」，不錯，舊禮教的確可以吃人，然而這個舊禮教，並不是先秦時代「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的禮樂教養，真正的禮樂教養，是孔家思想的精華，為他們政治哲學的神髓，我們去掉那些繁文縟節，但就禮樂的精神來說，的確有可取之處。而宋以後的道學家，板起面孔講道學，把禮樂的陶養，一變而為呆板的教條，樂的精神固然完全喪失，就是禮的本意亦被曲解，於是偏激矯情，以戕賊心性的教條繩之於人。對於男的，要他們規行矩步，少年老成，去體會所謂「聖賢氣象」，對於女的，要她們實踐三從四德，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以狹義的貞操觀念來束縛她們。總之，動輒就說這是「天理」，那是「人欲」，「君子」「小人」，鬧個不休。無怪乎後來戴東原要罵他們「以理殺人」了。這種吃人的舊禮教，的確又是「孔家店」的特產，把我們民族的蓬勃的朝氣，新生的活力，都消磨殆盡。弄得青年們一息奄奄，沉淪苦海，反認為是在「希聖希賢」，使孔子復生，亦當痛哭！即到現在，我們還觸處可以看到這種舊禮教吃人的事情發生，正是「孔家店」老闆們的拿手好戲。

三、「統」　「統」這樣東西是「孔家店」的看家法寶，遇到說不通，行不走時，就搬弄出來了。對於政治上，去替皇帝「保鏢」，大倡其「正統」「僭偽」之論。對於文化思想上，則修談其所相承的「道統」，以排斥別的學術思想為「異端」，講學授徒又有所謂「學統」以為門戶派系之爭。什麼事情，都以為天下真理在此一家，別無分號，一切是壟斷，一切是獨裁，「統」過去，「統」過來，千統萬統，把中國的社會政治學術文化各方面牢牢「統」住，就像孫悟空的緊箍咒一樣箍得緊緊的，再也休

想自由翻身。現在政治上的「法統」之爭，學術上的「學統」之辯，其根本來源，都不能不在「孔家店」中去找。

儒術與皇權的結合，鞏固了專制獨裁者的統治基礎，舊禮教的束縛，阻遏了社會文化的進步，而均以「統」這樣法寶來鎭壓一切。這些就是「孔家店」裏的貨色。五四時代倡導新文化運動，要打倒孔家店，現在大家要實行民主憲政，尤其非打倒孔家店不可。但是要打倒孔家店，應該首先認清這爿店裏所賣的貨色，不要漫無頭緒，亂打一陣就算了事。

四

最後再談談我們要怎樣去打倒孔家店？

一、先要知道先秦學術思想的博大宏深，然後才知道宋以後儒敎中人的局狹膚淺，沒有見到眞正的義理之「全」，而只是計執其「偏」，要知道眞正的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潮，然後才知道宋以後的道學末流，是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墮落，要打倒孔家店，第一步要了解先秦的學術思想，要了解眞正的儒家思想。

二、要知道「孔家店」中賣的是什麼貨色，及其眞正的弊害之所在，才能打入它的致命之處，把它打得倒，推得翻。像五四時代很多人那樣，根本不讀中國典籍，看到線裝書就頭痛，而又偏要喊打倒孔家店，試問如何辦得到，反而予想維持「孔家店」，重開「孔家店」者以口實，乘機做其文化思潮上的反動工作。要打倒孔家店，第二步不能不弄淸楚「孔家店」的本身。

三、世界文化，漸趨合流，人類精神，難於分割，應該借鑑於其他文化體系，諸如古代希臘，近代歐洲，以及印度文化等，作一比較研究，才知道我們中國的「孔家店」的思想，實在要不得，的確非打倒不可。而且借助他山，可以拿人家長處，來作打倒孔家店的助力。這正是要請德賽二先生進來，幫忙打倒孔家店的道理。所以要打倒孔家店，第三步就必需就世界各個文化體系作比較研究，才知道優劣長短，才能夠加以合理的抉擇

勝利以後，帝國主義的壓迫，算已打倒，有形的枷鎖，去掉了很多。而「孔家店」的打倒，則是徹底去除我們腦海裏的精神魔鬼，打碎一切無形的精神枷鎖。使我們能夠從近千年來的精神專制下，來作一個大翻身，擺脫一切封建意識，勇敢的去迎接時代新潮。這樣才能夠毅然決然的「變」過來，大刀闊斧的「改」過來，不僅是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然而，這就要大家覺悟，認淸眞正的「孔家店」，打倒眞正的「孔家店」！

關于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新憲典

魏登臨

編輯先生：　貴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三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出版），近由國內友人寄來，得一拜讀。此期中有樓邦彥敎授所著「自由、平等、博愛之再生」一文，係論法國第四共和新憲法者，分析確當，是一佳著。惟間或有誤解原文或遺漏之處，想係因在國內不易尋到完全材料之故。鄙人不揣蒭陋，願對該文誤解遺漏各點，與原著者商榷，俾使國人對此次法國第四共和之基本文献有一完全正確之認識。

魏登臨敬上　三月廿四日，巴黎

樓先生此文最大之誤解，在將此次法國新憲所創之「司法官最高會議」誤解爲最高法院。爲明白此會議之組織及作用，需先明白戰前法國司法官制度之弊。

在第三共和時代，司法官原則上是下級法官，需經過司法考試及格，然後再逐漸希望陞遷至上級。所有一切法官皆由司法部長直接或提請大總統任命（提請只是一個法定手續，事實上還由於部長之決定）。司法官之任命及陞遷，既操於司法部長之手，故司法官對行政界不便隨便開罪於人，政治勢力亦難免滲入司法界，司法之獨立與尊嚴難有完全之保障。

司法官一經任命，在法律上亦並非不可罷免。不過遇有懲戒處分或免

職，都必需經過一個「司法最高會議」之議決。這個會議就是法國大理院（Cour de Cassation）的全院會議。所有懲戒處分或免職，須符合這個會議之意見（avis Conforme）。

受此種保障者，並非司法官全體。所有各級檢察官及治安法官（担任審判之法官之最低級）無此保障。

所以法國在第三共和時代，司法官制度之弊，一在任命據於司法部長之手，二在保障不足，三在法官希望由下級陞遷至上級，不免受政治影響；結果司法權無應有獨立尊嚴。（關於此點，可參看 Barthelemy et Duez 之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及 Barthemr 之 Valeur de la liberte「自由之價值」第一百四十二頁）在戰前，法國鑑於外國之經驗，尤其是英國，對司法制度之改革卽有若干建議，但積重難返，始終無大刀闊斧之改革。直到此次戰後之新憲法，始有一個革新，卽司法官最高會議之成立是。

× × × ×

司法官最高會議（或可譯爲司法官高等會議（Conseil Superieur de la magistrature） 依法新憲八十三條，由十四人組織之：大總統爲主席（並非最高法院院長司法部長），爲副主席。由國民大會以三分之二多數，於其會員以外，選舉六人（并候補六人），任期六年。由特定法律規定，選舉四名司法官，代表各級司法官，任期六年（并候補四人）。另外由大總統於議會（包括兩院）及司法官以外或於司法職業界中任命二人（并候補二人）。

對以上各種構成份子之最後兩種，需加一點解釋。所謂「代表各級法官」，並非「代表法律的四個部門」。原來法國司法院共四級：第一級是治安法庭（justice de faix）是最初之調解法庭，第二級是初審法庭（Tribunal de Premiere instance），第三級是上訴法院（Cour d'appel），最後一級是大理院（Cour de Cassation）。現在司法官最高會議是於每級中由其每級全體法官公推一人爲代表另一人爲候補。（關於此點，現法國已於本年二月一日頒佈一道法律，詳細規定見「政府公報」二月二號）

其次所謂司法職業界（Des Professions jurdiciaires），是指在司法官以外，其他參加司法事業之人，如律師、訴訟代言人（avoue）、公證人（notare），法院書記官之類中，由大總統自由任命二人。

至於司法官最高會議之職權，依新憲法第八十四條之規定爲：（第一）除各級檢察官外，一切法官任命皆由最高會議提名，請大總統（卽會議之主席）任命。比較以前僅由司法部長提名或任命，要多一些保障。因此會議不但包括大總統及司法部長，並且有議會及司法官界本身所選出之代表參加意見及投票。（第二）關於監督司法官之紀律，保障其獨立，以及司法法院之行政，以後均由最高會議決定。

在憲法條文中，更明文規定「坐位法官」（magistrats du siege），卽除檢察官外參預裁判之法官，爲不可罷免。

如果看了司法官最高會議之組織及其作用，便可知此會議與最高法院（卽大理院）完全是兩事。

× × × ×

法國大理院在第四共和，尚未開有所改革，其組織成份如下：大理院法官共四十九名，院長一人，廳長三人，各司一廳（審査案件廳，民事廳，刑事廳），大法官四十五人，另外有檢察官及律師、書記官等

× × × ×

此外該文尙有若干小的遺漏與誤解。先言關於憲法序文部份。

（一）關於人權宣言，法國自一七九一年以來共有十五個憲法，差不多都有人權宣言或近似之條文，但並非只有一八七五年憲法，付之厥如，拿破崙第一之共和八年憲法及貝當大將一九四〇年之憲章中，亦均無此類條文。

（二）關於人民權利義務部份，第一部份第五節，原譯文爲「國家遇有危機時，國家要求所有的人民團結並負担同等之責任」。鄙見似應譯爲：「因國家大災難而生之損害，應由全體國民連帶負平等責任」。所謂國家大災難（Calacutes nationales），係指大天災如水災旱災或火災以及因戰爭兵燹所生之災害等，並非危機（Crise）。所有此種災害，應由國家賠償，用租稅方法向全體國民平均徵收。

（三）第六節，任何國家政治犯（因防衛自由而受迫害者）並非「一受檢舉，法國一律予以保障與庇護」，因爲這豈不成了干涉外國之內政了嗎？原文實意係：「凡因爲主張自由而受迫害之人，皆可到法國領域中享

受居留權」，即對所謂政治犯不能引渡之意，加以擴充而已。

（四）關於特種企業部份一節，實際應譯爲：「凡財產或營業，如其經營具有或獲得國家公共事務或事實上獨占之性質者，均應收歸公有。」所謂國家公共事務(Sewice Public national)指應由國家經營之有關全民之事務，其最基本者爲軍事，司法及警察。但國家職權，經營事務之範圍，隨文明進步及社會主義之興起而擴大，諸如煤鐵礦、水、電、煤氣、交通等，亦漸歸入國家公共事業範圍之內。法國光復後，實行國有政策，舉凡鐵路、水、電、煤氣、煤礦之國有，其理由即因其具有國家公共事務之性質。

所謂事實上獨占之性質，即言某種大企業需資雄厚，小企業無從抗衡，與之自由競爭，故雖無法定限制，但此種大企業取得事實上獨占之地位，馴至勢可敵國，操縱政治，此即所謂大財閥。法國光復後時，大銀行及大保險業之國有，即由其具有事實上獨占之性質。

（五）論法蘭西聯合國一部份，按在新憲中對聯邦制度僅列極簡之原則，一切詳細規定，將來另有單行法，僅僅根據人權宣言之簡單條文（樓先生對憲法本文關於聯邦制度，未加分析），即言「法國從此放棄其專橫的殖民政策，聽任各民族自治」，未免過早，試看安南近例即知。

× × ×

關於兩院制：

（一）共和院之選舉方式及組織，在新憲中並未規定，後來在去年十月廿七日會有法律規定，但只限於第一次之共和院，以後尙有新法律規定其組織及選舉方式。依十月廿七日法規定，共和院不只由各省縣市間接選舉，並且有國民大會及海外領域（從前之殖民地）地方議會所選之代表參加，非常複雜。

（二）共和院固然絕對無第三共和國上院之威風，這是因爲戰前人民陣綫時代，所有新政，皆爲上院推翻，所以此次左派各黨，決心限制上院的權力。但是說他「連英國上議院還不如或者與純任諮詢之經濟院，實際毫無差別」，則未免過分。因爲共和院在小黨林立（或至少無一大黨能擁絕對多數）之法國，仍有其重要性：

（a）大總統係由國民大會及共和院聯合選舉。

（b）共和院如果以其全體絕對多數否決某一法律案，則國民大會除接收外，亦應以其全體絕對多數，對共和院意見加以否決。但在法國無一政黨可在議會擁有絕對多數，必需多黨合作，如果共和院與國民大會之多數黨並非一致，則共和院可以阻制法律案之通過，因爲在法國一件法律，如果需得全體構成員（法定全體）之絕對多數通過，並非易事。

（c）共和院可以提付憲法委員會，請求審察國民大會通過之違憲法律。

× × ×

關於內閣解散權，亦小有誤解。依本憲法，內閣之解散國會權，有兩種限制：第一是每屆國會之最初十八個月中，不能爲解散國會之舉。第二是在十八個月以後，如果再於十八個月之期間有兩次倒閣之情形發生，始可有解散之舉。

樓先生文誤以在最初十八個月始能解散。

× × ×

關於憲法之修正，憲法委員會之職權仍有一項限制。

憲法委員會之審理範圍，只限於憲法本文（第一篇至第十篇）之規定，而不及於序文，即人權宣言。原因即在人權宣言所列皆僅僅原則，如果委員會有權審查某一法律是否與宣言所列原則抵觸，恐怕濫用權力，有流入美國最高法院，以其監憲之權，妨阻新政之弊。故憲法委員會之審理範圍，限於憲法本文。

三月廿四作於巴黎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客座記言

陳衡哲

五　平衡生活的一個方案

——文化價值的評判——

本節是「西方人「回到宗敎去」的意義』的下文，卽是所謂『非宗敎的方案』的一種研究，請讀者注意。又本節中談話的客人，凡有三位：李，楊，（已見於前數次的『記言』：）及一位姓丁的——某大學第三年級生，讀的是『洋古典文學。（編者按：『西方人「回到宗敎去」的意義』一文見本刊第一卷第十三期）

記載開始時，李丁二位青年正在辯論。

客丁：我還是說，中國文化是偏重精神的，牠不像美國文化的那樣物質化！

客李（漲紅了臉）：請讓我提醒你，卽在我們的中國，也有人提倡『倉廩實而知禮節』的人生觀呢。一個餓着肚皮的人，眞是所謂救死不遑，又那能再去努力於文化的創造？

客丁（也漲紅了臉）：餓着肚皮的天才，有的是。一個人遇到貧窮時，若就讓牠把自己壓倒了，那還成什麼天才？

客楊：聽到了你們兩位的爭辯，使我想起了那個『先有鷄呢，還是先有鷄蛋？』的問題。陳先生，你說是嗎？

主人：有點像。不過，辯論是能澄清我們的思想的，我們應該讓他們兩位再辯下去。

客李：眞對不起。我們原有點胡說八道，是不是？我想還是請陳先生指導一下吧；還有小楊，他的學識也遠在我們之上呀！（向客丁）你贊成嗎？

客丁：晤！也好。

主人：小楊是專修哲學的，我想請他先說兩句，好不好？

客楊：你如肯答應指正我，那我方敢嘗試。

主人：這一層沒問題。

客楊：有些人以爲西方人重物質，東方人重精神，那是一個大笑話。……（向客丁）請原諒！……這看法的可笑與危險，並不亞於偏執唯物或是唯心的人生觀者。

客丁：那你是不反對物質的人生觀了。

客楊：豈但不反對，而且還贊成！用一個最淺的例子，你想，假如不是靠了今天早午間的兩餐飯，和這個房間與桌椅，我們現在能這樣好好的談天嗎？但不必多說吧，這問題可能把我們引誘到玄學的邊界去——玄學是一件危險的玩意呀！

客丁：那我們應該有一個專重物質的人生觀了！

客楊：當然不是。（向主人）可不可以請你指導一下？

主人：我希望你們第一要注意，所謂物質與精神，大體上說來，雖是兩件很不同的事；但有時却也不能把牠們劃得太分明。比如，靠了無線電，我們可以享受優美的音樂；靠了電報，我們可以與遠離的家人及朋友通消息；諸如此類，我們能說牠們是純物質或是純精神嗎？我們對於一切學問，一切人生的問題，都應用這個眼光去看牠；而不應爲一個名辭所膠住。這一層說明了，別的話也就容易獲得了解了。……是的，方才小楊指出今天的兩餐飯，作爲物質生活不能偏廢的例子，我也有同感。卽如說美國的一般生活吧，有幾個人家是有工人幫忙的？但是，正因靠了美國物質生活的進步，所以一個家庭雖然沒有工人，而牠的主婦却仍一樣的能有閑暇去做她自己的工作——敎書，著作，藝術，社會政治的事業及其他。具體一點的說來，她口渴的時候，可以不用去先燒起炭爐子來煮開水；因爲自來水是都可以喝的。並且廚房中用的，不是煤氣爐，就是電爐；既省事，又清潔。再說到飲食吧：假使主婦要省事一點，她可以在十分鐘之內燒出一頓家常便飯來；因爲市上有的是收乾的湯，十分錢一包，用水一煮，就是四碗湯，在營養與味道上，都和新鮮的一樣。其他食物及各種生活的需要，也大抵如是。當然我們不願每天都吃這樣的紙包飯，但卽使一天一次，不也就可以省下許多時間來嗎？在我們古老的中國，假使沒有工人幫忙，你要吃湯，就必先去買一塊肉或是一隻鷄來，你若不會宰鷄，那也就沒辦法。宰好了鷄，你還得收拾牠，還得去生炭爐，切小菜，單單煮一鍋鷄湯，就可以占去你整個的半天光陰。這個省下來的時間與精力，不都就是一個人追求精神生活的資本？這不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互相倚賴的一個好例子？

客丁：可惜美國人這樣省下來的時間，常常又是被拿來做美女比賽之類的用的。

主人：這也不盡然；而且這完全是兩件事。……丁先生這樣的重視我國古文化，也是一件可喜的事；不過也須注意，不要又走入那『泥古不化』的一條路上去。況且時代是單軌的，人生是向前的，歷史是多元的。印度的尼赫魯說得好，『盲目的尊崇過去是不好的，輕視過去也是不好的，因爲這兩種態度都不能成爲未來人生的基礎。』

客李：並且，歷史既是多元的，所以我們也應有一個兼有唯物與唯心觀的人生。陳先生，你說是不是？

主人：很是。所以我們若要得到一個平衡的生活，物質的需要也是不可偏廢的，不過這需要應有一個限制吧了。方才丁先生所詛咒的物質生活，應是牠的濫用和誤用，而不是牠的本身。（向客丁）對嗎？

客丁：我想對的。那麼，對於方才我同小李爭辯的焦點——好萊塢——你的意思是，那也不過是一種物質享受的濫用和誤用了？

主人：對得很。你現在既明白這一層，我們不好再進一步看去。我們須知道，那好萊塢式的色情狂生活，又何嘗不把詩情畫意也拖到牠的區域中去。那些陳列大腿的女人不也自命爲藝人嗎？低能與低級趣味，不是同樣有牠們的精神剌激與陶醉嗎？雖然那剌激與陶醉，亦許是很粗惡的；但這已是一個審美的問題，已不是精神與物質的問題了，是不是？由此可知，所謂精神生活，又何嘗不能被濫用和誤用呢？（向客楊）現在請你接着說下去，好不好？

客楊：我且試試看。我們現在所同意的，已經有下面的兩點了；（一）物質與精神，是一個平衡生活的要素；牠們應是相輔相成，而不是相反相毀的。（二）牠們是同樣可以被濫用和誤用的。我們現在所要知道的，據我看來，也有兩點：人生的重心應該寄託在那一方面呢？又怎樣去避免那物質和精神的濫用和誤用呢？現在且先說那重心點：我的看法是，牠是應該在精神的一方面的。（向主人）對不對？

主人：對的，但是爲什麼？

客楊：我想，這是因爲物質與精神雖同樣是平衡生活的要素，但其間却有一個根本的不同；而這毫厘的不同，又可能成爲千里之差。這不同之點是：在物質方面，我們的需求應有一個止境——哦，我得到答覆了，這個對於物質需求的限制，不就可以避免牠的濫用與誤用嗎？——對於這個物質的限止，我想方才陳先生爲我們所引的，莊子所說『鷦鷯巢林，不過一枝』的人生觀，是最可以使我們深思的。但在精神的一方面，如我們對於學問的深求及人格的修養，那是應該有止境的嗎？

客李：啊，我眞高興聽到這個！我從前常聽到前輩或是書本上說，一個人應該知足；但有時又聽人說，一個人不應該自滿。我現在懂了，這完全是兩件事。

客楊：對於這個情形，羅素的解釋最好。他把人生活動的源淵，分爲創造慾與占有慾。用這個眼光看來，則只要我們能限制那占有慾，和剌激那創造慾——卽是所謂重心點的寄託，或靈魂寄託之點——別的修養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這看法對嗎？

主人：很對。因此，所謂把人生的重心點寄託在精神一方面的生活，也不應是消極的，而應是對於創造的積極的努力。因此，這生活決不是守在茅屋中的隱居或幻想，更不是消極的頹廢；牠應是一盞引路燈。

客丁：可不可以請你指示我們，用什麼方法去獲到這盞引路燈呢？

主人：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先，我們須先要了解到一個文化的內容。我現在且先問你們，你們對於中國文化的看法是怎樣的？

客楊：糟粕精華都多得很。

主人：是的，中國文化是這樣，別國的文化也是這樣。

客丁：照你說來，那就無所謂東西文化之分了。

主人：這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都不過是方便的名辭。在實際上，西方的古文化和新文化的距離，比了東西兩個古文化間的距離還要大得多。所以文化的分類應以牠的主要核心爲標準；我們若用這個眼光去看世界上古今的文化，就可能把牠們分爲人文文化，宗教文化，科學文化……但這已越出我們談話的範圍了。我現在要說的是，對於這種種不同的文化，我們正不必，也不能，一一的都去採用牠們；但我們却必需能了解牠們。了解之後才能批評，才能分別出牠們的精華與糟粕來。而這些精華也就是我們的引路燈。

客丁：可以請你舉幾個糟粕和精華的例子嗎？

主人：今天已經很晚，不能一一的申說了。我現在且在中國的古文化中舉幾個例子，其餘的留待以後再說吧。在中國的古文化中，我以爲第一應該淘汰的糟粕，應是那封建式的大家庭制度。……你們也各舉一個例子，好不好？

客李：那偏面的孝，那父不慈而子必須孝的道德敎條。

客丁：那就大家去學那美國的兒女吧：衰老不奉養，疾病不相顧，貧苦不相助，使人類淪於禽獸！（向客李）好嗎？

主人（笑）：你們兩位的立場雖不同，但所說的却也各有各的道理。這原也是一個大問題；不過，『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惡父與逆子雖是兩件相反的事，但牠們却同樣是社會的不祥與不幸。

客楊：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曾想過許多時，將來我們似乎可以把牠討論一下。

主人：很好。我也願意和你們談談。但現在且說今天的問題吧。還有什麼糟粕的例子嗎？

客楊：那『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的觀念。

主人：很好。不過，還有一層須注意：這些例子是都有時代性的，那就是說，牠們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社會裏，是有過若干

貢獻的；後來社會及時代改變了，牠們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了。凡是一個制度到了沒有存在的必要時，若仍繼續的存在着，那即是牠貽害人類的開始。大家庭制度如是，君子不勞力的觀念也如是，所有社會上及政治上的一切制度，也大抵如是。這些都是以精華始，以糟粕終的例子——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是舉不勝舉的。此外還有一種絕對的禍害，一種自始至終的糟粕。你們能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嗎？

客楊：罌粟的風格。

客李：鴉片烟的吸食。

主人：對得很，這足見你們是眞能了解到這糟粕與精華的分界了。

客李（向客丁）：丁先生，請你也舉一個例子吧。

客丁：我是一個老頑固，我仍相信，中國的文化是遠在美國文化之上的。

客李：那你爲什麼又來美國讀書呢？

客楊：小弟弟們，不要再爭了。（向主人）可不可以請你舉幾個精華的例子呢？

主人：有是有的，但都還不曾整理過。好吧，隨便說幾個吧：比方剛才所說的，莊子對於人生物質需求的看法，我想即是一個例子；孟子的『所惡有甚於死者』的哲理，又是一個；范希文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做人標準，也是一個；『三不朽』的人生觀，又是一個。……我無庸一一的舉出來。你們且同去多多的想想，多找出幾個這樣的例子；再把牠們分析及綜合起來，這可能成爲一個以精神爲重心的，平衡生活方案的基礎。

客楊：這方案應該叫做什麼呢？

客李（向客楊）：請恕我打岔一句。我們既把重心寄在精神的一方面，那麼，『平衡』兩個字不有點矛盾嗎？

主人：問得很好。這是因爲人生原是偏向於物質的享受的；所以我們必須把生活的重心放到精神的一方面，然後方能得到一個眞正的平衡。……（向客楊）你問，這方案應該叫做什麼呢？據我看來，叫什麼沒有關係，因爲一切的名辭都是被用的太濫了。若你必欲給牠一點範圍，一個界說，那亦須看你尋覓的結果而定：牠可能是一種生活的哲理；可能是一種藝術的人生觀；可能是一種道德的新標準；而在歐美，這尋覓的結果也可能就是那個『回到宗教去』的運動。所謂『殊塗而同歸』，我們又何必拘拘於一個象徵的名辭呢？

客丁：我可以請問，那『同歸』是什麼呢？

主人：那當然就是以人爲中心的修養與上進了。

客楊：智識的追求，在不在這個範圍之內呢？

主人：我們若能利用智識，那牠當然也在這個範圍之內；但假若我們反而被牠利用，那麼，牠不但不能輔助我們的上進，而且還有被牠拉着向下墮落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我希望你們同去再多多的想一想。

客楊：哲理，藝術，道德，宗教，智識的兩面鋒，……同去眞夠我想幾天的！（站起，客李客丁也隨着站起）今天已經累你太多了，下次再來請教吧。

（上接二十一頁）

這時候我的好奇心開始減退，而我的胃口在增加了。跟傑子作伴，最初也許會使我們失笑，但是末了不免使我們感慨。所以我推託說，記起了另一個約。依禮賞了那老婆子一塊錢。我就告辭。鐵先生對我保證，假如我等著，兩點鐘內，準可以開飯。

（註一）：英國十八世紀風行頭髮裏拌粉，戈爾司密斯在本集第三信內，形容當時風尚：理髮師先把頭髮剪短，然後用麵粉和猪油的混合物，把頭髮膠粘，成一頂小帽子似的，再在後面裝上一條尾巴，直拖到畜牲們長尾巴的地方。

（註二）：格里蘇尼 Guiseppe Grisoni 爲十八世紀畫家，專畫人像和歷史故事。

（註三）：VauxhallGardens 十七十八世紀，倫敦最熱鬧的遊藝場。

（註四）：Horns 指 French horns，Vauxhall Gardens 遊藝節目之一。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一、惠寄通信，請儘量每篇不超過三千字。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薄酬。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五、順便徵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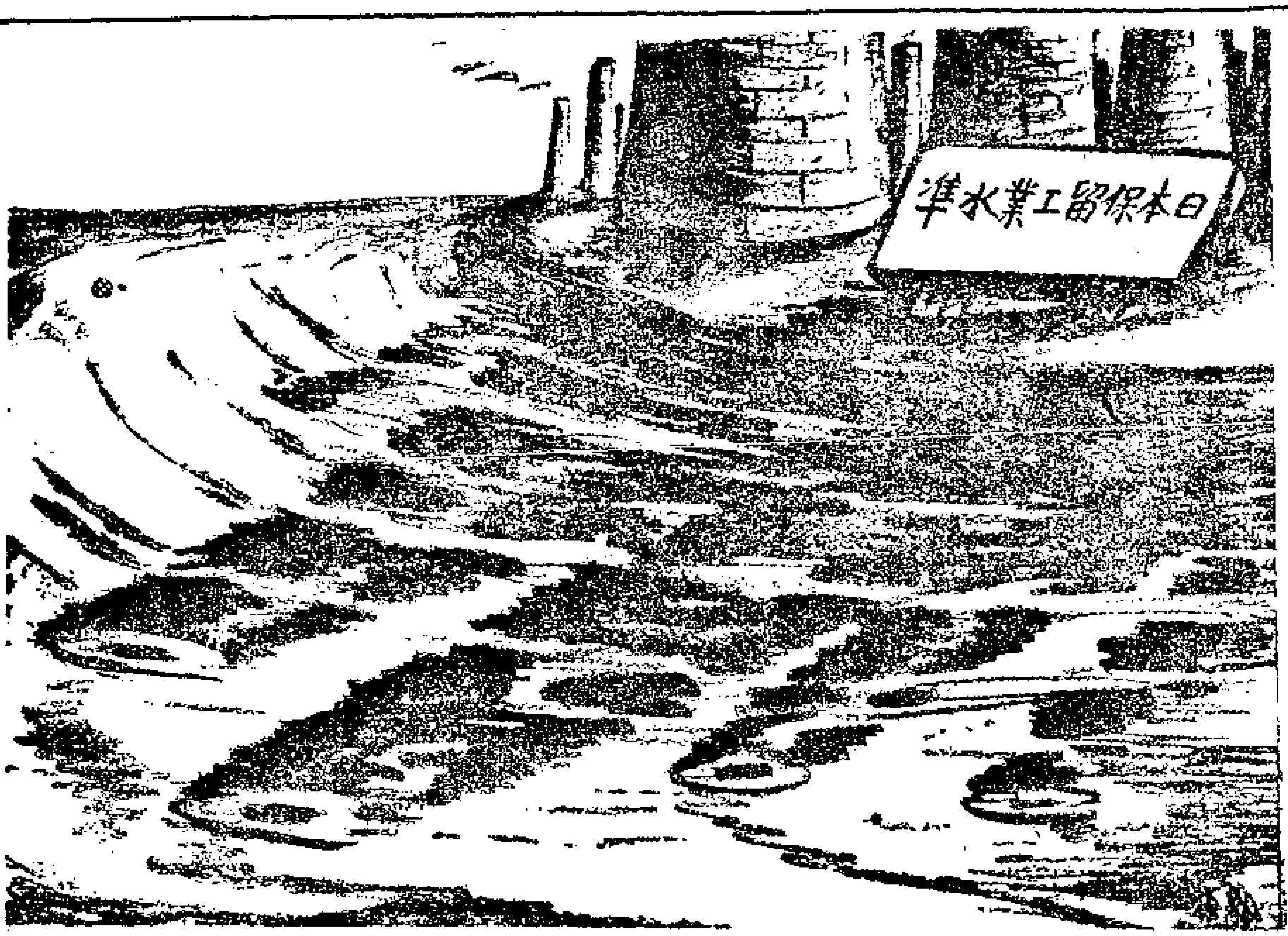
編者啓

趙家璧主編

晨光文學叢書

本叢書創刊以來，已在國內出版界中別樹一幟，不但選稿精良，本本俱屬名家名作，且裝幀美觀，印刷上乘，開本一律，極宜收藏。第一期新書五種，均已售罄再版，第二期新書最近出版，第三四期新書已在印刷編輯中。此後按月有新書出版，愛好文藝讀者，請隨時注意本叢書廣告。

又是需要我們的時候了



亞洲的暗影 ←

觀察通信版

五四前夕胡適專訪記

——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本刊特約記者

青年與干政

「中年的知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知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替他們開口了。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爲中年知識階級縮首袖手，不肯干政。」

胡適校長很嚴厲地聽着「胡適文存」二集卷三，二三四頁上面的一段話，但非常負責地說：「是的，我到今天仍然是這麼想，這種說法，對於古今中外都很適用。」這是「四五」的前十天，一個久旱不雨的煩惱春晨，他從煙盒裏拿出一枝煙，沒有燃，便又放下了。

「青 人應當享受青年人的權利，需要遊戲，需要娛樂，需要求學，但到政治不能滿人意，又沒有合法的機構來改革的環境之下，干涉的責任便落在知識青年的雙肩上。過去的太學生，東林黨人，到今天的情形更不必說。外國也是一樣，歐洲、俄國、印度、到處都有很多的例子。反之，當政治上了軌道，青年們去玩，去讀書，去運動，去求愛，便也沒有了青年運動。」

胡適博士對於中外古今的青年運動在不良政治下發生，下了一個總結論：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五四運動

翻轉歷史，回到民國八年的四五運動，一個不僅是青年的，而且也是劃時代的運動，在胡適先生的嘴角展開了。

「五四運動是一個有組織，沒有領導，自動的，爆發的。一個祕密而可靠的消息，引起了這樣的一個大運動。」

那正是第一次歐戰之後，四月起在巴黎的凡爾賽宮開和會。對於中國山東問題，日本代表在四月二十八日作了一個欺騙的諾言，口頭上承認除經濟外，山東的軍事政治可以交還給中國。美總統威爾遜也上了當，在五月一日承認了和約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條。巴黎和會上中國有南北兩政府的代表，王正廷代表廣東革命政府，陸徵祥代表北京政府，但對外是合作的。當這個出賣了山東的消息到了北京，政府並不敢發表。

「當時有一個外交委員會」，胡適說，「委員有熊希齡，汪大燮，林長民，還有蔡元培先生。那時候，因爲杜威博士五月一日來華，我並沒有在北平。這壞消息是五月三日傳到北大的。五四恰好是一個星期日，由北大發起，聯合中等以上的學校學生開了大會。陳獨秀那天在北平寫了一天的文章，本來像包腳布那麼一單張的每週評論，出了專號。我在上海歡迎杜威。到五五還驚訝各報沒有了北京專電。五四的歷史，便是巴黎和會中，我國要求失敗，由一羣搗亂的孩子們自發而沒人領導地弄出來的。」

胡先生一再在集會上也表示並非謙虛，·眞像就是如此，爲了怕將去有人寫錯了，變成假歷史，說是只由胡適領導的。

「那次大會的主席，好像就是段錫朋，會上決定整隊遊行（那時還不知道示威），表示兩點，一是要盟國主持正義，一是要懲辦曹、陸、章賣國賊，先到東交民巷各盟國使館請願，游行到了趙家樓，有人知道曹、陸、章在裏面開會，到時卻大門緊閉，便用疊羅漢的方法跳進去，對於曹的老太爺，姨太太都不會傷害，只是打壞了章宗祥。忽然起火了，有一說是學生放的，有一說是曹家人放的，總之，學生便退出來了。警察所吳炳湘派了警察來彈壓，隊伍亂了，譬如傅斯年那次曾碰掉了眼鏡，毛子水也擠落了鞋，結果抓去了一三十三個學生。」

學生們所發的傳單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爲口號，用白話寫的。胡先生以文學革命家的眼光來欣賞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白話傳單」。白布的大輓聯上「淚輓」曹陸章「遺臭萬年」，還有主持要「誅」三人的，（那時還不懂得使用釘倒字樣）。有標語用這樣的句子寫「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之類。

「政府當初疑心是黨派鬥爭，對交通系如何如何，用高壓，主嚴辦，一方面下令嚴學生的愛國運動，一方面又在褒獎曹、陸、章諸人。三十三個學生由各學校保出來之後，這運動一天比一天擴大，滿街的演講隊，勸人抵制日貨。六月三日，這一天，政府決心嚴辦，一下子提了一千多人，先把北大法科改爲臨時監獄，第二天，又抓了一千多，又在北大文科開闢了臨時監獄，並且指定由學生供給伙食。學校那時窮的不得了，那有這筆錢？只好由私人組織起來，送一些飲食給這些「國徒」們。政府派兵戒嚴，從東華門，北河沿封北大，計有二十座帳棚（杜威小姐曾給這些勇士們照了幾十張像片，可惜目前已找不到了），日夜看守，使全國爲之震動。

「那時候，上海領導着罷工罷課，總商會也宣布了罷市三日，天津、漢口、杭州、重慶、廈門、廣州、各地響應。這消息連日到了北京，政府對於罷市特別看的重，拖到六月六日，軍隊悄悄帶着帳棚撤了，學生恢復了自由，又陸續在街上講演。十日那天，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十二日內閣總辭職，十三日總理錢能訓免職，換了龔心湛，徐世昌也表示辭職，後來卻沒有辭，至少，

這是一次倒閣的運動了。

「在歐洲的學生，組織了糾察隊，王世杰、鄭毓秀，都是那時的打手，包圍着表團的住所，不許他們去簽字，要他們表示正式拒絕。」

從五四直到六月二十八日，這個運動才算告一段落。

歷史的趨勢

「當我們創辦『新青年』雜誌時候，我們曾表示有二十年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的決心，希望是在政治以外，在思想及文化方面奠定新的基礎，不必說『新青年』，只看學生們所出的『新潮』，內容及寫作，雖不談政治，也震動了全國。

「朋友們之中談政治的也有陳獨秀、李大釗、高語罕等人，民國七年十二月，在我同家的時候，他們創辦了『每週評論』。到了四五運動之後，北大就成爲全國的領導者。」

胡適先生指出五四運動的影響有極顯著的幾項，譬如：

「教育的工具有了大的改革，白話文的使用蔚爲風氣，民國八年到民國九年的一年中，白話的小册子竟有四百餘種之多，全國風行。民國十年教育會議決定小學教科書改爲白話，後來又決定初中教本改爲白話。工具的改革，這個運動乃起了思想的革新的始基。

「由於白話文的使用，便有了新的文字，不論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都有了新的成就。而且由各個角落的年青人參加了這個運動，貢獻了不少新的作品。

「思想革新是很重要的，百家平等，打倒了儒敎一尊。杜威走了，羅素又來了，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一九一九年傾有了社會主義入中國……。

「各黨派的政治家那時明白了青年是最大的力量，白話是最大的宣傳工具，研究系的三個報『國民公報』『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都有了白話的副刊。南方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和『建設雜誌』也改爲白話。國民黨改組以後，更擴大了基礎，吸收知識份子，共產黨有陳獨秀，少年中國學會有李大釗……」。

對政治上的影響無疑是更大的。胡氏鄭重地說：

「我們的思想、文化的運動變爲政治的，變質了，這不能說是一個錯誤，而應認爲是歷史的趨勢」。

一個退步

「今天有沒有五四運動的條件呢？」許多人都想這樣問。

胡適先生的眼光在厚厚的鏡片下閃動着，他幾次避開正面的回答，僅僅說這是要你們新聞評論家作的推論。最後，他却這樣說道：

「國民革命是民族主義的革命，二十年了。凡是民族主義的革命不免是保守的，一些守舊份子總是說，老祖宗的都是好的，這種觀念的擴大，使思想與文化上的進步，很受影響，很有退步。甚至師範學校裏都不敎國語，討論的題目是『中國本位』，組織了文化的革新。白話文推進了二十年，而公文仍然是文言。有的而且越發的典雅。

「國民政府初年，敎次劉大白建議公文用白話，用標點，如今什麼都沒有了，一句話，不滿意。從我的立場上，從文化的立場上，我要提倡革新的態度，文化、思想，還是欣賞歡迎五四運動時的德先生，賽先生。」

胡適先生在談話中還時常要提到蔡先生，語意之間有無限的景仰。在去年十月十日北大復校典禮的儀式上他曾說過：

「蔡先生不是有口才的人，也不是筆鋒上帶感情的人，他的口才吶吶，寫文章不過三百字。可是他能以學術爲目的，我們來剝奪了他的機，他反而高興，他眞是大公無私，他能給別人以權力，他信任別人，他配作領袖，就在這個時期內，有了五四運動，思想革新，文學革命。」

「第一次歐戰結束，教育部在天安門開提燈會，蔡先生要求借棚三天，供北大師生，作羣衆講演。先生願人民了解世界有了新轉機，並寫過以『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爲題的文章，說明歐戰勝利的意義有四：（一）黑暗的强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二）陰謀消滅，正義發展，（三）獨裁專制打倒，民主政治發展，（四）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胡先生說：這些意見今天仍然用的到。蔡先生是德與賽的合流，事實上，這在今天仍是中國的重心問題。青年們今天怎樣走？胡先生的話中這次不曾觸到，但半年前他曾公開說道：

「你們在大門上貼着標語，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爲什麼我要你們『獨立』，而不說是『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對外束縛者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不能獨立，仍然是作奴隸。我是說，要能不盲從，不受欺騙，不用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用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用別人的頭腦當自己的頭腦。我提倡你們應有走獨立的路的工具。這就是說學校當然要給你以自由，但是學校不能給你以獨立，這是你們自己的事。」

在最近一些日子裏，北大的牆內頗有煩惱，自然這些煩惱多是與牆外空氣有關的。爲了壁報被撕的問題，胡先生的話頗由學生這樣記載道，「辦壁報是白白糟蹋時間，我並不希望你們做，你們只能把它當課餘的『游戲』，——玩意兒。所以不要把他看得太嚴重了。你們專門駡人，甚至畫起敎授的像，簡直是下流。牆上給你們糊得紅一塊綠一塊，實在不成樣子，你們要避免人家撕，我勸諸位少帶刺激，免得招惹是非……。我聽××先生說壁報上有一篇八達嶺游記，之文章做得很好的，爲什麼你們不多寫那一類文章……」。

胡先生承認他是這樣批評過的；他加重道：「爲什麼不寫一些切切實實的文字，而硬畫一些麻臉敎授呢？地盤並不少。不是有文匯報還可以投稿嗎？只寫在壁報上，我又怎麼能一一看得到？」

對於今日的教育政策，胡先生表示『太不正常』，小學規定了六年免費的憲法要待爭取，公立的中等學校應加多，而地方財政却又太窮。國立大學可以不花錢來住，則又是世界所稀有。譬如在北方，私立的學校也不能加費（除上海有幾個例外）。

「北大有二千三百學生是公費，佔百

分之六十。學校給他們準備衣服，只用二千元一套來買。」

乾燥的春天，乾燥的心情，游人們折完了天安門內的花樹，又在中山公園普遍偷花，有人用了「一葉知秋」的原義，而認爲由從小孩到成人私折花而知四十年新教育的失敗。胡先生聽了這話，連忙說：

「外國的教育從沒有得到過這樣的結果」。他跟着又道：

「教育上的毛病，只有用更多的教育，才能有救。」

胡適先生是位樂觀論者，遇事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如對政治黑暗吧，他表示羨國有一種擬議運動，有黑暗亦有光明。

革命家的話

五四運動之後八個月，——孫中山先生在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給海外同志的信上指出這運動與革命的關聯：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爲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爲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僞政府，猶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創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命，皆此之謂。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價值之事。」

胡適先生過去引用了這段話。今天又在讚美中山先生的偉大之後，慨說「五四」這些年已不時髦，在國定教科書內已經沒有了。但是，「想不到今年又熱鬧起來了。」

同樣一句話呼之欲出的是：

國內外比第一個五四時更險惡的局勢也更在逐日加深了。

（四月二十四日）

記修築中的青新公路

此線通過柴達木盆地向西伸延
新疆或能因此路而與內地密接
建設或控制西北交通均屬第一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西寧通信）青海在地理上正當我國中心，抗戰以後，四方人民往墾者日衆，其地之經濟既漸趨發達，其地之實況亦漸爲國人注意。交通事業，在此種刺激下，頗有進展，而其最近之中心工作，則在青新公路之加速完成。

考我國通新疆之大路，在古代以陽關爲基點，北至北庭，南下于闐，均自此出發。戈壁千里，人煙闃絕，而竟克修築工路，設置郵傳，無怪千百年後之今日，如斯坦因氏亦徘徊于其遺跡而驚服其偉大。準噶爾興，征服全疆，軍政中心，移往北路。故滿清收復茲土時，所採路線，一由星星峽，一由阿爾泰。其後因河西與哈密密接，商旅乃均取星星峽一道。民國二十二年，綏新公司創闢寧甘北部草道，自明水、廟兒溝入哈密，然星峽交通，並未受其影響。三十二年，新疆局部變亂，國家慨於控制開發之不易，故首先恢復陽關古道，自玉門出塞，經安西、墩煌入新，沿哈順沙漠北，下米蘭，抵婼羌，然此一路線，仍須以河西爲基地，與星峽一路相較，只脈胳不同耳。河西面臨外蒙，形勢頗勝，但僅以此窄形走廊，控制開發數千里外之廣大國土，終非盡善，故中央于三十四年決定興修青新公路，由青海都蘭南行，至智河曲折而西，傍柴達木盆地南之戈壁與鹹地，越巴爾圖河西北向，入新境之紅柳溝口，上通婼羌，以加強內地與新疆之聯繫。同年十一月，八戰區交通司令部，戰時運輸管理局與青海省政府等洽商結果，決定具體辦法，主要者爲，築路方法利用築路機械二隊，由青海征調民兵八千人，甘肅征調民工三千人，新疆酌調民工若干，協同修築，路線全長估計爲二千公里，完成時期預計二年。實施工程由青海省府主持，並由交通部派技術人員及會計人員協助。此外對調撥汽車，建修房舍等，當時均有具體決定。

三十五年四月一日，青新公路工程處成立於西寧。二十八日查勘隊組織完成，出發查勘。此隊係由青省府與第七區公路工程管理局會同派員組織者，沿途所歷，備極艱苦。於同年七月五日到達新境紅柳溝口，與南疆公路接綫，完成查勘任務。八月十五日返抵西寧。彼等查勘路線達一、二三六公里，盤山線尚未計算在內。至於該路起點，原定都蘭，經查勘後，改爲倒淌河。

修築情形

青海內部，政令統一，與全國較，只寧夏可與倫比，故與辦一事，省府如有決心，事功均可如期而就。三十五年四月成立十個工程總段，沿線設八個儲運站，自五月二十二日起先後開工，迄十一月，因氣候關係，暫停。計自倒淌河至宗家一段路基已大部修竣，自宗家至叉吐勒一段，完全打通，工程簡易處，並予完成。總計修築路線，長八百公里。沿線大站之房屋工程，如西寧工程處辦公房屋、職員宿舍、修理廠、及察汗烏蘇站房、驛地站房等，均于預定期內完成。此一年內之工程，因甘新兩省民工無着、築路機械未到，僅由青海民工士兵担任。三十六年開始，青

省府於二月十六日省委會上議定，本年工程由保安騎兵第二總隊內調派士兵一千名，西寧市及樂部、同仁、化隆、循化、貴德、同德各縣應征僱民工由一千二百名至二百五十名不等，民工每名付與六個月工資硬幣六十元、食麵三百六十斤及衣著工具等，並發與脚價代金。所有應征民工應由縣長親率前往工作地，並由縣府轉飭鄉鎮長前往，負責管理、監督、施工。至本年工作，預計(一)按標準改善並完成倒淌河至奴吐勒全線路基，(二)奴吐勒至茫崖一段新工，採隨測隨修辦法，按照標準，盡力完成，(三)倒淌河至察汗烏蘇一段，擇要鋪築路面一百公里，(四)沿線橋涵，擇要修築，(五)繼續完成倒淌河茫崖間站房，車房，並修築湟源、大喇嘛河、沙柳河、香日德、宗家、諾木洪，甘森等站房。三月起已開始動工。自茫崖至紅柳溝口之二二五公里，因距青省中心過遠，轉輸困難，究由駐新疆之第六區公路工程管理局修築。

沿途瘴疫

按青新公路所經地面，鮮有人烟，大部份爲沮洳地域，戈壁、鹹灘，遍佈于脫脫、紅柳溝口之間，佔全線四分之三以上。運輸既感不便，水草更形缺乏。盆地復多毒泉、惡草、巨蚊、飛蠅，員工深受其害，牛馬日有死亡，工人亦時患疾病，而氣候變化無常，差數最高一日間竟達攝氏四十餘度，施工異常困難。且煙瘴甚大，計有寒瘴、熱瘴、毒瘴三種，行旅視爲畏途；將來全線成功，亦須對環境進行改造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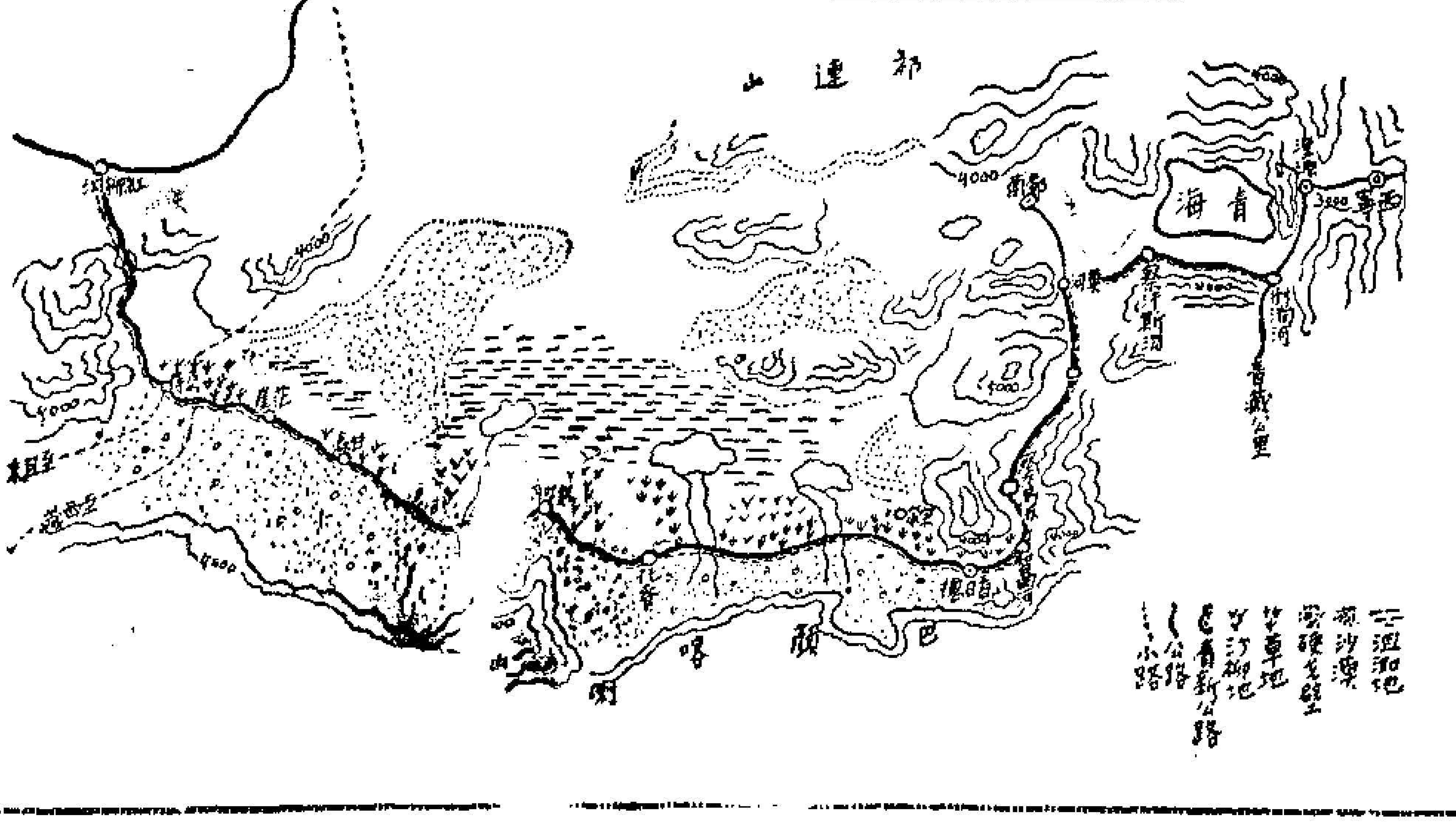
柴達木盆地

青新公路傍柴達木盆地而行，柴達木盆地居青海西北，面積約佔青省三分之一，係因柴達木河流貫其間而得名，地勢低平，罕見大山，半屬草原，半屬沙漠，爲太古湖澤之遺跡，尙餘鹹湖多處。草原肥美，便于游牧，故居民爲蒙藏二族，文化落後，生活多貧苦。按柴達木盆地所蘊藏之富源至豐，以鑛產、藥材、鹽鹹、牧畜爲主，惜多未開發。去歲秋工程師學會在西寧召開，曾有考察該盆地之議，聞現已由地質調查所等機關組成考察團，甘青二省協助進行，五月間或可出發。

西北與交通

我國幅員廣大，國人多未能有機會對之認識，此次新省變故，再一度刺激同胞，目光轉向西北，青新公路，果能認眞修築，不假過去西蘭公路、寶天鐵路之敷衍點綴，則不僅對新疆與內地之聯絡上，增加力量，且可助青海與南疆地方經濟之發展。一般人多謂中國貧困，人民生活過苦，不足以言大規模之建設，然二十年前蘇聯于國內外之威脅與不安下，且能完成一般建設，白海運河，莫斯科窩瓦河運河與莫斯科地下鐵道亦均于國內饑饉時期建成。土西鐵路，通過中亞戈壁，沿途荒涼，亦未聞蘇當局望洋興嘆。蓋苟利國家，其國家當局必突破一切困難，雖使人民當前遭受若何犧牲，亦所不惜；就人道言，固屬殘酷，但爲第二代或千百代人民着想，忍痛割愛亦未可厚非。中國雖窮困，然試就每一城市作一較詳細之居民職業與生活調查，則可發現居民中有無量數之不勞而獲者，亦即專以資金維持其中等或高等生活之人，至酒肆茶樓、街角之象棋攤、市場之游藝所，經常聚集多數羣衆，以之較工廠內汗流浹背之工人，固爲對中國之大諷刺，以之與寶藏在地之荒涼西北對比，其諷刺更大。中國必須能組織人力與財富，始克使國家得控制建設若千之果，非然者，此初步建設，亦有難長久維持也。建設西北，交通第一，控制西北，交通亦第一，顧國人共圖之。（三月十五日）

青新公路略圖



隨鐵大少回家

楊絳譯

譯自戈爾司密斯的世界公民(Goldsmith: Citizen of the World)。這集子包含一個中國哲學家——所稱世界公民——從倫敦寄給北京典禮院院長馮宏(Fum Hoam,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eremonial Academy at Pekin in China)的一百多封信，寄他的兒子的幾封信，兒子寄他的信，和寄給荷蘭商人的二三信。戈爾司密斯從一個世界公民的觀點，形容和批評英國社會。本文是集中第五十五信，寫一個愛擺闊的窮措大——鐵大少(Beau Tibbs)

我看，我那新相識不容易甩掉。昨天在公園散步，又碰見這位大少爺，掐著我肩膀，十分熟悉的招呼我。他還穿著那套衣裳，頭髮下的粉更多些（註一）襯衫更髒些，戴一付眼鏡，夾著帽子。

我知道他不是壞人，還有趣。他對我殷勤，不能板著臉不答理。所以我們就親密的一同散步，幾分鐘裏，浮泛地談遍了各種話題。

不多久，他就僻性畢露，趕著幾個衣冠齊楚的人鞠躬招呼。看他們還禮的態度，準是毫不相識的，他又時時掏出袖珍小本，當了衆人，假裝記錄事情，一件重要忙碌的神氣。這樣做作著，他領我穿過了公衆散步的過道。我一方面惱他荒謬，同時覺得自己也連帶著受了遊客們訕笑。

我們走到盡頭處，他興奮地叫道：「傢伙！我從沒看見公園那麼清，今天就沒看見一個人，沒看見一個臉。」我不耐煩的打斷他道：「沒人？那麼大羣的人還說沒人？人太多了。這幾千個笑咱們的不是人！」「噯唷，好先生，」他十分和悅的答我：「你好像生大氣了。理他們呀！人家笑我，我就笑人家，彼此扯直。我那朋友郭王爺——老郭——生長在外國的，我們倆有時候合了夥滑稽，說的幹的全是笑話。可是我看你正經得很——你要是願意有個優美的，正經的，多情的人在一起，今天你該跟我內人同吃飯，我非請你不可。我介紹你認認我那鐵太太，頂高雅的一位太太。她從小是——這話，不足為外人道啊——她從小是奧乃子爵夫人管教的。天生好嗓子，可是不用我說，回頭咱們叫她唱一曲。你還該見見我小女，凱羅萊娜、惠爾海爾彌娜、阿梅麗亞、鐵小姐，一個甜淨美麗人兒。我為她相定了鄧王爺的大少爺——不過，這話咱們朋友談談，不足為外人道啊——她現在才六歲呢，已經會跳小步舞Minuet，吉他彈得了不起的好。我立願要教得她多才多藝。頭件事我要造成她做個學者，我將來自教她希臘文，為了教她，我要學這文字呢，不過，這話不足為外人道。」

說著，他不等我回答，他抓住我的胳膊，拉著就走。我們穿過好些黑弄和彎曲小道，因為，我不懂什麼緣故，他規避著一切熱鬧街道。末了，我們總算到了一所陰黯的屋子門口。這屋在出城的過道上，他說卜居近郊，因為空氣好。

我們從另一個小門進去，這門延迎賓客似的永遠開著。我跑上了吱吱作聲的破舊樓梯，他在前引導，一面問我可喜歡景緻，我回說喜歡。「那麼」，他說：「我給你看一幅世界上最可愛的景緻，就在我們窗外，咱們可以看大船航行，可以居高臨下的眺望二十多里寬闊的大地。我的朋友郭王爺情願出一萬金磅買那麼個景緻。我呢，我有時和氣的對他說，我總喜歡把景緻留在家裏，使我的朋友們多來來。」

這時候，我們已經跑到樓梯盡頭，不能更上一層了。他滑稽地說，這是從烟囱倒數下來的第一層樓。他敲著門，裏面一個帶蘇格蘭鄉音的聲音問是誰。我的嚮導回說是他，問的人不滿意，再問。他提高聲音回答了，一個老婆子才閃縮不願地開了門。

進門之後，他十分多禮的歡迎我光降。又回身問那老婆子太太在那裏。老婆子一口蘇格蘭話回答道：

「說實話，她在隔壁洗你的兩件髒襯衫哪！因為他們發誓不再出借洗衣盆啊！」

「我的兩件襯衫這？糊塗蟲胡說些什麼呀！」他詫怪得話都說不清了。

「我可明白得很，」她回說：「太太在隔壁洗你的衣裳，因為——」

「天打雷劈的！少胡說吧！」他嚷了。「去告訴她，咱們來了客。——這蘇格蘭老太婆，她在我家就一輩子，也學不斯文，也改不掉她那可笑的嘔人的鄉音，也顯露不出一一星星大人家氣息。真是怪事，要說，她還是我一個朋友——一個國會議員薦給我的，他是個頭等高貴人物——不過，這不足為外人道。」

我們等着鐵太太的時候，我乘間觀察一下屋子的陳設。有四只舊的繡墊椅子，據說是他太太的刺繡，一張曾經日本漆的方桌，屋角一只搖籃，另一角放著一只笨重的櫃。壁爐架上擺著一個破牧羊女，一個沒頭的中國老爺，牆上掛著幾張沒鏡框的不值一文的畫。據說都是他自己手筆。「你看那牆角上的人頭像如何？我照著格里蘇尼（註二）筆法畫的。畫得很勻稱，是我自己的臉。雖然跟我倘有不像，一位子爵夫人，要我照樣畫那麼一張，曾經還過一百磅，我拒絕了。這傢伙！再來一張，那是畫匠的事了。」

好一會，他太太出來了。臉塌而又風騷，很瘦，還留存著美的痕跡，她再四道歉她怪寒磣的卸了裝見客。不過，希望別見怪，因為她通夜和子爵夫人在浮克司毫花園（註三）裏。子爵夫人太愛聽號角。（註四）她又對丈夫道！「真的，別忘了告訴你，子爵乾乾滿滿一杯，祝你長壽。」他嚷道：「這老傑克，真是個大好人，我知道他對我的情分。可是，我希望，你已經吩咐他們安排開飯了，你不必張羅，咱們只三個人，弄點兒精緻的，一點點就成，一個比目魚，一個黃花雀，一個——」

「或者你說怎麼？」他太太打斷他：「來一小片牛臉頰，滾燙滾燙的，加上點兒我自己的沙司——」

「好極了！」他回說。「這東西最好配啤酒吃。可別忘了給做些咱們公爵愛的沙司。我就恨你們整大塊的肉，鄉氣透了，略為知道講究的人，見了都倒胃口。」

（下接十五頁）

觀察文摘

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

原作者：傅雷

原刊處：四月廿四·廿五日文匯報

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國人很少用不偏不倚的立場，觀察國際關係。進步份子也有近乎教條主義的成見，同時更受熱情的蒙蔽。服膺某種主義的，以為天下的「是」都在這一面，天下的「非」都在那一面。不幸事實並不如此簡單。儘管主義是對的，政策是對的，戰術還可能有錯誤。而且一個國家無論奉行何種主義，決不會一成不變。比宣傳與號召更重要的是生存，為了生存，縱使與主義背道而馳的政策也得執行。我們承認它這種權利，但若它求生的戰術妨害了另一個國家的生存，這個國家當然也有反抗的權利。然而信仰令人對這麼簡單明瞭的事實也會盲目。戰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犯了很多大的錯誤，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經交相指摘。但是蘇俄對我們的行為也不見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紅軍在東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廠，進步的刊物噤若寒蟬，不贊一辭。中蘇條約公佈，國內所有的報紙，不分派別，一致頌揚。這些現象怎麼解釋呢？難道我們獨立的人格還沒建立？難道我們不會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想？

一九三九年德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聯與芬蘭開戰這兩件事，聽說在延安也有少數人懷疑，但既不敢明白宣說，也不曾推究出一個真正的原因。那時，我曾經跟青年朋友討論過，他們無論如何不承認蘇聯也有它的國家主義。在純潔的心靈中，國家主義似乎與蘇聯的理想與主義根本不相容。青年人為了維持固有的信仰而不承認現實，固然可以原諒，但究竟不是一種進步。

前年十一月中蘇條約公佈以後，有一般少數人士，一方面要求民主，贊成社會主義，一方面又重視國家權利，把正義與和平等看做高於任何主義；他們當時很嚴厲的指摘中蘇條約，特別關於中東路與旅順大連的部分；不久他們又指摘紅軍的掠取東北工廠。但大多數人認為這種態度是「頭腦不清」。的確，到現在還有人覺得只能有兩種人：不是親蘇，便是親美；反蘇的必親美，必近乎反動，甚至就是國民黨的尾巴。正如國民黨右派認為親蘇的必反美，必近乎異黨奸匪，或竟是共產黨的尾巴。他們都不能想像另一種人，拋棄了自己的良心，不問對方是誰，只問客觀的事實；既不親蘇也不親美，既不反蘇也不反美，但誰損害了他們的國家的利益就反對。在這樣的左右夾攻之下，真正的輿論就難以建立，而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渺不可期了。

美國人的錯誤，在於只看見自己的利益，——恐怕俄國人也難免吧？——中國人的錯誤在於不看見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知道用別人的眼鏡看自己的利益。推本窮源，我們太不瞭解蘇聯；不過跟美國人的誤解蘇聯，剛好處於兩個極端。雖然觀察的角度、用意、結論，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全部相反，但所誤解的對象——蘇聯外交政策的本質，是相同的。

史諾揭示蘇聯的二重人格，解釋現實主義政治的原則，狡兔三窟式的蘇聯外交，用歷史與事實，證明國家主義在蘇聯外交政策中不但存在，而且居於第一位。另外一個熟悉歐洲問題的記者，約翰·史各脫，在一九四五年就分析過「俄國三度空間的外交」。在某程度內，國家主義不是一個壞名詞，蘇聯的友人毋庸為之諱言，倒是應該當做客觀的事實加以研究。

「……蘇聯每個領袖都有兩重人格：第一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關心當前的安全與勢力問題；其次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理論主義者的信徒。這種二元的情形見之於事實的，是蘇聯政府一方面努力與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合作，另一方面努力支持共產國際——它卻是立誓要推翻資本主義國家的……所以外國的政治家與觀察家，連美國的共產黨員在內，對於俄國在國家立場上生命攸關的利益，和往往純粹是理論的抽象觀念或宣傳作用，老是攪在一起弄不清楚。」

「一切蘇聯的宣言，實在需要同時用兩副眼鏡去讀的。」

我想，像史諾這一類的觀察，對國內多數人士還是很新鮮的。他們似乎停留在相信世界革命不久即可來到的階段，從沒留意俄國新經濟政策的產生，李維諾夫在國際聯盟的外交，近十五年蘇聯對中共態度的改變等等，究竟由於何種原因，反映蘇聯政策怎樣的轉變。他們不知道「蘇聯的代表，不論在國內國外，以純粹國家主義者立場說話的時候居多，而以馬克思主義者立場說話的時候較少；但兩種立場兼而有之的時候還是最多。」他們不像史太林一樣相信兩個不同的制度可以並存，可以和平合作；反而因美蘇關係的緊張，更加強調兩個制度衝突的不可避免。其實，光明的來到，決沒有熱情的信徒所想像的那麼快，達到光明的路也並不是只此一條，並無他徑。半世紀來，多少國家實行了議會制，但有沒有兩個國家的議會制是一模一樣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到現在還沒完成。以為光明就會來，是低估了敵人的力量；以為光明的路只此一條，社會主義只有一種，便好像「教皇無誤」說一樣，會產生不容忍與迫害，從而妨害改造世界的大業。而有意無意的主張「與資本主義的戰爭不可免」，更是忘記了下一次戰爭不但是某個社會的毀滅，而是全人類的毀滅。然而這一點，不但史太林明白，連美國的軍人也明白。

對於國內問題，中共從十餘年的實際政治經驗中，似乎已覺悟到時間與空間的重要，懂得了「事實的邏輯強於任何的邏輯」。否則，西安事變不會那樣的結束，抗戰根本不可能，而新民主主義也毋庸提出了。但他們還沒機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露面，所以表現在內政上的一部分智慧，在外交上就沒有，只要看延安報紙對美國的批評就可知道。

在批評國際局勢時，非共產黨的人，照理更應當持重；但他們太重視抽象的理論與機械的教條，忘記了政治是一切科學中最實際的，太着眼於未來的烏托邦，忘記了自己的生存、種族、時間與空間，使敵人振振有詞的把帽子亂戴。我順便提到這一句，並非勸人慎防帽子，而是指出過於重視理論的表現，在內政上並沒建設性的效果，反而把無黨無派的面目弄糊塗了。我也決不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但像歌德與席勒，在日耳曼四分五裂之時自命為「世界公民」，距離現在究竟太遠了些。

倘使我們的最後目標，眼前會妨害生存，那末只有把握當前的問題，就事論事，把未來的暫且擱起。這並非放棄目標，正如史太林求和平的政策，並非就是放棄共產主義。以我們的現狀而論，遇到任何友邦以國家主義對付我們時，我們單單壓制自己的國家意識，眼睛只看着美妙的理想，決非掙扎圖存之道。委曲求全未始不可，有時甚至必需，但委曲求全只是一種手段，並非目的；而且自己心理要明白這是「委曲」。至於在錯綜萬狀的國際爭議中，假如分不清雙方的眞正意與假姿態而一味作左右袒，或過事張皇而誇大局勢的危險，或跟着旁人抨擊對方，甚至當蘇聯尚未放棄和平合作的時候，我們倒以爲不可避免的衝突就要來到；那末，除了暴露自己的幼稚以外，對世界和平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戰後世界的動盪，大半是暫時的。三強的力量遲早會覺得一個均勢。在平衡的局面（不問這局面只能維持十年還是廿年）未實現之前，一些表面的磨擦，絕對不是可以燎原的火星。美蘇之間並無當前的利害衝突，雙方的經濟磨擦，過去沒有，將來也很少可能。蘇聯既不需要國外的原料，也不需要國外的市場。像英國反對派工黨克洛斯門所說，現在決不是墓尼黑的前夜。那末美蘇關係的緊張，眞是軍火商或戰爭掮客煽動起來的嗎？或者如蘇聯所宣傳的，是 估資本主義必然的趨勢嗎？我想，雖然美國人認爲左傾的史諾，也不會肯定這種說法。史太林說過，資本主義國家再不能包圍蘇聯，即使他們心裏想要，也辦不到。

事實上，在重新支配勢力圈的國際會議中，總是由恐懼心理控制着各國的外交家。恐懼的原因不外乎對自己缺少信念，對旁人多所誤解。美國固然流行恐蘇病，蘇俄也有遺傳的排外主義與共產黨的傳統恐懼。要消除他們的猜忌而促進了解，不是我們能力所及。但第三者少動感情，少作偏袒，在消極方面至少可以不助長他們的猜忌。雖然馬歇爾調解中國事件的報告書，確言中共並沒得到蘇聯的援濟，但美國人始終覺得中共的擴張即蘇聯勢力的擴張；再加中國反動派的惡意宣傳，使美國更覺得精神上受了蘇聯的威脅。所以非共產黨員的中國人，大可不必加強美國人的錯誤印象。我不說我們爲此就不抗議美國對我們的不公平的行爲，但至少要使美國懂得，這種抗議純粹是爲了國家生命攸關的利益，而不是黨爭的手段，更不是附和另一個國家的表現。尤其在莫洛托夫望天討價，美國人着地還價的當兒，儘管他們面紅耳赤，惡聲相向，第三者也可稍安毋躁，不必像美國共產黨員一樣，動輒鑽入政治牛角尖。

反之，倘使我們的報章，除了傾揚俄國式的民主，殲滅法西斯的英勇戰蹟以外，還能分些力量，客觀的報導蘇聯政治、外交、社會各方面之情形，分析一下史太林不要戰爭的原因，結果不但對我們國內政治有良好的反響，即對美蘇關係也不無貢獻。

（上接第二頁）發生的時候，筆者適寓廣州。那時廣州的羣衆十分激奮。不久在香港交界的深圳，英警又無辜鎗殺了鄉民張添祥。這連串的不幸，激發了廣東大衆的憤恨。深圳的民衆，組織了張案後援會，廣州各界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實地募款，救濟二祥（王水祥，張添祥）的遺族。其後擴大組織，由工商各界實行對香港取不合作政策，斷絕經濟往來。但不管羣情如何洶湧，當局卻聲言循外交途徑解決，不許操急從事，致礙邦交。這樣一來，還等於滿清時代的慘案，便以有礙邦交而竟不了了之了。本來，『百忍無憂』，這是先賢的明訓，爲着國家的大計而姑取容忍的態度，這固不能深爲責備，但爲甚麼在八年抗戰之後，百業凋零，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而不能稍事忍讓，以按政協的決議和平建國，而乃進行毀滅性的全面內戰？這使我們疑惑，何以對外尚能容忍而對內乃反其道而行之？難道寧可送給路人，而不願分給家人麼？抑或以能犧牲此小小的二祥而無介於中，乃能進行此大規模的內戰，置萬民命於不顧？

一萍　四月廿三日　無錫

天下第一無腦筋事
又一例

編輯先生：貴刊二卷八期王春芳先生所說的「天下第一無腦筋事」的洋迷信，現在市面上，又有一種更進一步流行更盛的「連鎖儲金」；爲使先生明瞭起見，茲將該項連鎖儲金章程寄上，即請參閱。其中第三條『如行此法，當有拾萬友人每位送你壹仟元，即可得國幣壹億餘元。』這完全是利用一般人不勞而獲的墮落心理。因此許多青年學生都迷眩於這一條，照此實行。此事不僅使人浪費許多可貴的光陰，糟蹋許多郵票紙張，實際上，這完全形同非法的征稅；那些發起這種「連鎖儲金」的人，簡直是社會上變形的匪徒！

想吧！我們的國家現在到了多麼窮困的地步，需要我們每個人，埋頭刻苦，認眞努力，以充實社會的生命！但是現在偏有這種欺詐貪買的惡棍，卻只須在家中坐着，便可不勞而獲得這樣一筆鉅款。但是他對社會卻貢獻了一點什麼呢？名爲儲蓄，實則詐騙。這實在是一個大大的社會蠹德問題。可是發起人是多麼的巧妙，由於第一人姓名的遞次取消，他這罪犯便已逃得無影無蹤了！

張旭初　四月十九日　崑山

本刊附啓

一、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册，刻正加印重裝，自五月一日起，每册售壹萬伍仟元。外加郵費：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一次購滿五册以上，八折優待。

二、自五月一日起，第一卷各期零售，每本定價壹仟伍百元。

三、二卷一期業已再版，週內即可出刊，讀者補購及同業批發，歡迎從速。

四、定戶惠款，若由銀行匯寄，請於附言欄內詳塡匯款人姓名、地址、起期、寄法；若由郵局匯寄，請註明由上海九江路儲匯局兌付字樣。

五、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望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戶寄刊封套油印封簽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六、本刊一卷廿四期所附意見書，承讀者踴躍塡寄，至感興奮；原定四月內統計發表，嗣以編者抱病入院就醫，致未能如期刊出，深引爲憾。茲已開始整理，當將結果於最近期內發表，敬請讀者釋注！

七、凡有關事務方面而接洽函件，慎勿寄交私人轉遞，以免貽誤，是所至幸！

及時行樂 旅行最宜

因時代之進展，吾人之責任加重，故吾人對於身體健康，應加意愛惜。欲增進健康，當從事正當之娛樂，苟能利用大好時光，結伴旅行，探幽尋勝，既廣眼界，復暢胸襟，實有無窮樂趣。我兩路沿線，極多名勝古蹟，足供中外人士之遊覽。茲摘錄重要者列後，以供參考。

南京　中山陵　明孝陵　燕子磯　玄武湖　秦淮河　夫子廟　雨花台　靈谷寺

棲霞　紗帽峯　天開巖　白鹿泉

鎮江　金焦北固諸山　竹林鶴林招隱諸寺

無錫　梅園　小箕山　蠡園　黿頭渚　惠山　錫山

蘇州　虎丘　留園　天平山　靈巖山

松江　佘山

嘉興　南湖　烟雨樓

杭州　西湖　靈隱　天竺　虎跑　淨慈寺　雲棲　九溪十八澗　紫雲洞　六和塔

▲欲知詳細請向下列各問訊處或營業所詢問▼

問訊處
上海電話：四二四三三號
南京電話：三二一二五號
杭州電話：二七一六號

營業所
上海電話：四五九二一號
南京電話：二一二八〇號
杭州電話：一四三九號

京滬區鐵路管理局運務處啓

中宣部審(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上海華豐染織廠

註冊商標

出品：
織花線呢　士林色布　學生布　條子府綢　素府綢　校服布　藍色布　漂布　漂白斜紋　元色斜紋　嗶嘰　健美呢　條素絨　縐紋呢　大家布

商標：
醒鐘　華豐　美球　月美　健美　美亭　大路　女學生　園園　撲蝶

總務處　上海天津路四二六街四號

電報掛號　五一四八　電話　九二六〇三　九一四六九